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2) 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明清之际，风云变幻，造成了不少的风云人物。本文所写的吴三桂，即是在明清两代交替中起过重要作用、叱咤风云的人物。

吴三桂，字长白，先世居徽州，后迁高邮，又流寓辽东。因此史书一般称之为辽东籍高邮人。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12—1678年），终年66岁。其父，吴襄，武举出身，累官至都指挥使，后受命镇守宁远，后又迁总兵、京营中军府都督等职，参加过大凌河之战与北京保卫战。后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及其子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养子）均武功非凡，屡立战功，历任显职。此外，吴襄、祖大寿的亲友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光等，均见显于武事，充任辽东各级军事将领，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这就为吴三桂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三桂在家族影响下也走上了武举之路。先出董其昌门下，后以父荫为都督指挥，成为一名边将。崇祯初年，吴襄曾不幸被敌所围，吴三桂展其才略，率家丁20人杀入重围，救出其父。这样，吴三桂在大同城下救受困明军一战，以勇敢善战闻名于天下，时人称之为“孝闻九边，勇冠三军”的少年将军。

此后一个时期里，吴三桂多次参与了同后金（清）的战争，成为一名十分得力的边将。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他上疏朝廷，推荐吴三桂，经兵部决定，吴三桂被任命为团练总兵官，这年他只有28岁。

吴三桂自任总兵的那一天起，就认真地训练士卒，使之成为一支善战之师。同时他也在谋划御敌之策。他在向崇祯帝的一道上疏中提出五条大略和一条建议，明确提出战则必须两镇联营并进，互为犄角，马步联营，奇正迭出，援须联络策应，守则必须对力弱诸城贴助以兵等。此后的事实证明了他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只可惜在松锦之战，其建议未能付诸实施。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松锦之战，是明清争夺辽东的重要战役。明朝经此一战，精锐丧失殆尽，清朝则乘胜进击，将关外四城——松山、塔山、杏山、锦州占据，为进一步向山海关逼近创造了条件。

松锦战后，吴三桂因失利责任而被朝廷颁诏斥责。且予以降职处分。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为了阻止清兵逼近山海关，又“诏镇将吴三桂守宁远西四城”，同时又将其父吴襄调入京师，委以提督京营重任。受命于危乱之中的吴三桂，积极谋划攻防战略，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固守宁远。这样，就使得清军无法逼近山海关，难以逞其入关之志，所以只能绕道蒙古，越口而入。

李自成顺利进军，使坐镇北京城中的明朝最高统治集团惊慌失措，他们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是否调吴三桂前来捍卫京师。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六日，崇祯帝颁布了召吴三桂弃地入关的圣旨。

为了使关外明民全部撤入关内，吴三桂调兵遣将，以精锐部队殿后阻止清军的尾追，尽力动员当地人民随军入关。当地人民闻讯后纷纷收拾细软随军西走，其人数竟达50余万。吴军同关外民众经过数日奔波，3月16日方才入关。入关后，吴三桂即将随行民众安置于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安置一毕，吴三桂统军西行。3月20日，当吴军进抵丰润时，惊人噩耗传来，李自成已于3月19日攻克京都。驻军丰润的吴三桂从来往京都的使者、家书

中，对崇祯帝的下落、北京的情况多少了解了一些。为了慎重从事，他决定暂时驻师丰润，静观时势的变化，然后决定去留。

可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27日，驻扎丰润的吴三桂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重新夺回了山海关，李自成的二万部队溃败，这就等于宣告了吴三桂的态度：同李自成决裂！3月29日，山海关被吴三桂夺取的消息传入北京，李自成立即作出决定：致书劝降与物质笼络两手并行。然而吴三桂心意已定，他在布防山海关的同时，又做了三件事，一是致书其父严辞相诘，二是公开打出同李自成对阵的旗号，三是派出使者向清朝乞援。

吴三桂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农民军进京后纪律败坏，加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策略，诸如追赃拷饷，不重用知识分子，不采取措施与清方取得联系，不采取得力措施稳定拉拢明朝有势力的将帅等等，说明其难成大事。如此下去，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必败无疑，因此吴三桂断然决定不与李自成合作。这正是他发布反李檄文、公开打出反李旗号的原因所在。

其次，拷掠吴襄全家，严重侵害了吴家利益，这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决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最后，李自成大将刘宗敏霸占陈圆圆，这对吴三桂的影响不小。这也就历史上所谓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陈圆圆，名沅，字畹芬，小字圆圆，江苏武进奔牛里人。其父以沿街叫卖为业，人称货郎。货郎死后，家中生活无靠，圆圆乃失身为妓。她自幼受爱唱歌曲的父亲影响，也是好唱善歌，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加上长得标致出众，年稍长即名闻远近，知者多赞为“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不久，这位歌妓名传京都，声播关外，连身居辽东的吴三桂也有所闻。他特遣心腹，赍重金往聘圆圆，可惜晚了一步。崇祯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已抢先聘去了陈圆圆。

自入田府之后，陈圆圆甚不惬意，因为她早已风闻辽东吴三桂也曾赍金往聘。她知道这位将军不仅武功超群，而且相貌堂堂。所以在陈圆圆看来，吴三桂才是她的意中人。可她是一位卖身为妓之人，其身何能由己。既归田氏，即使对吴将军有意也是枉自费心而已。

在陈圆圆寄情辽东之际，吴三桂也神留京都。吴三桂往聘不得，愈感陈圆圆之可爱。所以，在圆圆为不得事吴而怏怏不快时，吴同样也害着相思病。

幸好天赐良机，促成了吴三桂与陈圆圆相会。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攻克西安后，崇祯帝欲用关宁铁骑拱卫京师，故颁旨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平台引见。吴三桂接旨后即日出发，催马扬鞭，向京都飞驰。

吴三桂入京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田府。何以如此迅速？原来李自成农民军势盛，前方官军败报连传，在京诸臣十分关注时势的发展，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命运。王室宗亲比诸臣更甚，他们对受皇帝召见的人特别是武将十分关注，对前方战报设计猎取。近来，田府主人为李自成的顺利进军而忧虑万分，万一北京保不住，他的地位、财产将随着易主而丢失掉。为此，他难以自安，非常注意时势动态。当吴三桂来京诏书颁出不久，他便闻知了。陈圆圆虽身为歌妓，然除去有一副好嗓音和一个好脸蛋外，还是一位聪明伶俐的人。她见田弘遇这位生来只知道食山珍海味，衣锦绣丝缎，饮陈酒佳酿，玩佳丽美女，从来不知几家悲哀几家愁的人，竟然也忧心忡忡起来，知必是为其骄奢淫逸的生活难以自保而不安。当她从田弘遇家人口中得知吴三桂入

京的消息后，冥思苦索，思虑良久，她主动为田府主人进计解忧。她对田弘遇说：

“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何不缔交于吴将军，庶缓急有恃呢？”

田弘遇答以：“此何时，我与之缱绻，不暇也。”

“吴慕公家歌舞时，公鉴于石尉，不借人看，设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吗？盖以此清，当必来勿却。”

陈圆圆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田弘遇邀请吴三桂入田府来观歌舞。

田弘遇接受了陈圆圆的建议，立即拜帖邀请吴三桂进田府来宴饮观乐。吴三桂平台引见出宫后，正在设法踏入田府，但是却苦于无计可施。未料田弘遇亲至舍下相邀，正中下怀。三桂欲就故却，至田弘遇恳求再三，他才登田府大门，戎服临宴。入宴移时，田弘遇令奏乐起舞以助酒兴，也就在这时，吴三桂才见到了他早已神往的陈圆圆。陈圆圆那优美动听的嗓音，那令人陶醉、倾国倾城的天生丽质、美姿佳貌，给吴三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当场激动地为之叫好：“卿乐甚妙！”临行之际，吴三桂竟公开向田弘遇提出要求，望其能以圆圆相赠。对圆圆姿色十分看重的田弘遇听到此言不觉怒形于色，其家人见状则规劝他说：

“现在国家动荡不安，把希望都寄托在统兵将领上。吴将军受到皇上召见之恩遇，他日成功凯旋归来，那么皇上赐之以二八佳丽，则必自然之理。君侯您既为皇亲国戚，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现在美女如云，那么又何惜一女子而失欢于吴将军呢？”

田弘遇为了笼络吴三桂，只好忍痛割爱。因此他听从了家人的建议，将陈圆圆赠给了吴三桂，终使二人如愿以偿。但就在陈、吴二人高高兴兴奔回吴府不久，崇祯帝的圣旨已传来，令吴三桂迅速出关。

吴三桂本欲携圆圆一同出关，但是有两个原因却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一是其父吴襄出面劝阻，他的理由是，君令在即，重任在肩，不宜携爱妾同行。因此吴襄建议三桂单骑出关，待事稍缓，由他设法将圆圆送至宁远。二是吴三桂正妻张氏也非等闲之辈。此人行事有见地，貌虽非佳丽，可是也说得端庄秀丽，吴三桂对之也惧怕三分，如果不事先通气，求得她的谅解，贸然携一佳丽归第，万一张氏闹腾，事情也不好收场。权衡再三，他决定先暂时将圆圆留在京师，待他日相会宁远。

然而，就在吴三桂赴宁远不久，李自成农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北京，身任提督御营之职的吴襄整天忙于应付京城内外的防务，一时难于抽出时间处理圆圆的事，所以陈圆圆一直在北京吴府中等待。直到农民军攻克北京，陈圆圆尚在吴府未遣。

吴三桂对北京方面一直放心不下，特别是北京失陷的消息传来，他更是坐卧不宁。3月20日，他给在北京的父亲吴襄写去了第一封信：

“听说北京城已被攻陷，不知此事是否确实，我估计大约是城已被包围了。如果可以想办法逃出来，就请马上行动，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可秘密埋藏。请父亲转告陈圆圆，我身体很好，要她耐心等待。”

第一封信发出不久，他派往北京的探报也回来了，他得知北京确已被攻陷。未待父亲回信，他接着又发了第二封书信。

“得探报京城已陷，儿拟即退驻关外，倘事已不可为，飞速谕知，家口均陷贼中，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

吴三桂发出第二封书信后，接到了父亲吴襄的来函，知其已降李自成，

且谎称陈圆圆已赴辽东。吴三桂很不放心，于是又第三次写信询问详细情况。此信是3月25日发出的。

“接20日谕，知己归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顺，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惟来谕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策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

第二天，即3月26日，从北京逃出来的吴襄之妾与吴府家人至三桂营中，吴三桂见面后立即催问家事。

“我家没事吧？”

“家已被李闯王查抄了。”

“我父亲他没事吧？”

“他也被李自成的军队关起来了。”

“我那圆圆也没有出事吧？”

“她已被贼人刘宗敏夺去了。”

当他得知父亲及全家被掳确信后，3月27日即以突然袭击方式夺取山海关。之后又马上给其父写了第四封信：

“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呼哀哉！当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仅无生理，故飞禀问讯。”

羽书刚发，吴襄的信送来，他再次谎骗吴三桂，称陈圆圆安然无恙。可是受过一次骗的吴三桂并不相信，只得又再次修书讯问详情。

“奉谕陈妾安养在宫，但未有确实之说，究竟何来？太子既在宫中，曾否见过？父亲既已降顺，亦可面奏，说明此意。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立刻降顺。”

事实上吴三桂对吴襄之言已不甚相信，他觉得其中必定有诈，并怀疑书信也是受人指使而写。不久经过其谍报人员的努力，终于得到了陈圆圆已被刘宗敏霸占的确信。这样，吴三桂集国仇家恨床第之愤于一身，决心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决裂，于是便公开打出了反李旗帜。

4月13日，李自成命李牟、牛金星等老弱守京师，他自己亲统20余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山海关。4月17日，李自成兵至永平。此时吴三桂为了阻止李自成东进山海关，结虚营于关外，组织当地民众诡为军士、执旗鼓守营。由于这些人无力抗拒李自成大军，所以很快被李自成击溃。初战告捷，李自成大为高兴，随军从征的宋献策觉得其中似乎有诈。如果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的话，能这么迅速地一击即溃吗？于是，他劝李自成保持高度的戒备。李自成率兵临山海关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为防吴三桂东逃，又调兵二万人，截断其东出之路。4月19日，吴三桂令全军聚演武厅，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敌。由于吴三桂兵力有限，决定先去会见多尔衮，请清兵合击李自成。

4月21日，吴三桂等率精兵在炮火掩护下杀出重围，飞驰前往欢喜岭，会见多尔衮于威远台。后来二人即献血盟誓，约定共击李自成因。4月22日，山海关战役全面打响。23日下午，正当李自成与吴三桂打得精疲力尽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兵绕出三桂之右冲击李自成。李自成农民军遭此突如其来的冲击，一是毫无思想准备，二是他们与吴三桂已打得精疲力尽，经不起以逸待劳的清军冲击。所以一时坠戈抛弓矢者无数，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吴兵、

清兵分道追杀，李自成全军溃败。李自成仅率散骑数千，退入永平。

李自成农民军还未来得及休整，吴三桂就已兵临城下。然而，双方经过权衡，并未再度交战，而是迅速达成了和约。之后，吴三桂撤退了包围永平的军队，在远离永平的地方扎营，李自成则在整肃军队后，即于次日撤兵永平，4月26日回到北京。回京之后，李自成立即着手部署战略转移之事。

4月27日，吴三桂传帖京师，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肃迎候东宫。刘宗敏等于北京城下连兵18营，与吴三桂展开了城下争夺战，结果大败而还。李自成便于4月29日匆匆举行了登极大典，杀掉吴三桂家30口，然后匆忙西撤。吴三桂在后紧紧追赶，又败李自成军于定州，后又再败于真定。5月初，吴三桂放弃追战，率兵回京，准备入京立明太子即位。

但是，正当吴三桂准备入京奉明太子即位时，多尔袞传檄吴三桂西行追敌，因为此时多尔袞所率清兵已占领北京。

就在多尔袞进驻北京并采取措施安定社会、稳固其统治之际，吴三桂也正在统军回师北京。师至绛州，未料吴三桂竟与陈圆圆在此相会。

人们会问：既然陈圆圆被刘宗敏掳去，西撤之时，刘宗敏何以不令其随之西行？吴襄全家30余口被戮京师，陈圆圆又何以脱生？这里还有值得一书的往事。

4月13日，李自成东征山海关之时，刘宗敏仍把陈圆圆押在军中随征。山海关战败，李自成恼怒吴三桂已极，于是在离京之际杀戮其全家，并想杀掉陈圆圆以解心头之恨。没有想到正当李自成令人推出、刀架陈氏脖子之时，颇有胆识的陈圆圆并无畏惧之色，而且她对李自成柔声说道：

“妾闻吴将军已卷甲来归，徒以妾故，又复兴师。今杀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于王，奈何？为大王计，宜留妾以系其心，当说彼不追，以报大王之恩也。”

听完了陈圆圆的这一番话，李自成也觉有理，留其一条性命，或许还能系住吴三桂的心。于是，就下令释放了陈圆圆。此时刘宗敏经山海关与北京城下两战之后，已清醒了许多，战况与局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暂时与酒色分离而为大局着想。所以，当李自成决定释放陈圆圆时，刘宗敏并未持异议，陈圆圆得以留住京都。

自山海关大战后，因当时情况紧急，生死攸关，所以吴三桂并未把访觅陈圆圆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等到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西逃后，他才派人四出寻找，终于在北京觅见，因而就有绛州之会。

吴三桂与陈圆圆在绛州停留数日，备述相互离别隔绝之苦，特别是当陈圆圆追忆北京被掳之事时，吴三桂对强行掳掠圆圆的刘宗敏恨之入骨，发誓不手刃此人，枉为大丈夫！吴三桂此誓最后终于在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得以实现。这一年吴三桂与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追击李自成农民军，在湖广与刘宗敏相遇。刘宗敏力战被俘，吴三桂总算擒到了自己最切齿的敌人，并就地绞杀，实现了他的誓言。

吴三桂回到北京，被清朝册封为平西王。在清朝笼络加封吴三桂之时，南明弘光政权也在设法与其取得联系，并以高爵厚赏奖其报君父之仇的“义举”，欲使吴为南明所用。然而，吴三桂审时度势，最后决定了自己的对策：防清廷之嫌，远南明之使。南明与清廷议和的使团到达山东沧州时，即派人前往山东吴府，将弘光帝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制敕呈送给他，并附书函一

封。吴三桂并未启封，而是原样地交付了清廷派来的监视者。

当京畿、山东等地安抚已定，清朝顺利完成迁都事宜后，清朝统治者下达了进军山西、陕西的命令：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大将军，西讨李自成，命吴三桂从山东回师西下，随阿济格西征。

阿济格、吴三桂一路，出边之后会合边外军向西进发，自保德州结筏渡河，进逼绥德，克绥德。吴军自绥德乘胜攻克延安、鄜州，然后直逼西安。吴三桂统兵为先锋，所向披靡，斩首数万，农民军大败而退。至此，李自成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实行战略转移，放弃西安，出武关南走湖广。

继西安之战后，黄州战役是又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役，在此战中，吴三桂亲擒刘宗敏，缢杀于江边，刘宗敏部全军覆没。李自成自黄州败后，又被阿济格等败于武昌、九江，最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消息传入北京后，清朝统治者认为心腹之患已除，遂下令阿济格、吴三桂等班师回朝。

清朝廷对吴三桂作了特别的安排：一是将吴三桂晋封为亲王，以示笼络奖赏之意；二是令吴三桂率其所部离开京师，出镇锦州。令将其所属兵将分屯于宁、锦、中右、中后、中前、前屯诸地。

吴三桂对其用心，也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也只好将计就计，移镇关外。自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到顺治五年四月近3年的时间里，吴三桂的活动基本上消失于史册，除去有零星的有关吴三桂仪仗与礼仪方面的记载外，别无他载。清廷的目的也在于让他在无职、无权、无事、无聊中度过他的后半生，死后还得以置于故地。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总出乎人的意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顺治五年（1648年）清朝已经占领的地方再起风波，局势发展对清朝统治十分不利，清廷不得不再次请吴三桂率兵出关平叛。吴三桂也借此机会重返关内，经过几番激战，终于再定山西、陕西。清顺治帝亲赐宴见，并赐其金册金印，以奖其二定山陕之功。

刚平定山陕回师不久的吴三桂，尚未得到喘息的机会，又接到了清廷出征四川的圣谕。从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一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吴三桂一直率军驰驱西南之地，与其他清军一道最后平定了四川、云南、贵州。之后清廷又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后清廷又命其出师缅甸，彻底消灭了永历政权，擒获永历帝，收降了白文选。吴三桂得到清廷的特别嘉奖，除控制云南外，又令其兼辖贵州事务。从此开始，吴三桂就成为镇藩云贵大权在握的封疆重臣。

云贵地处西南，与当时其它边鄙之地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民族杂处。杂居于此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该民族与明朝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清廷定都北京后，开统一天下之始，西南诸族也在统一之列。吴三桂作为平西大将军，统帅大军平定了西南。之后，为了镇抚西南，清廷命吴三桂又驻军云贵，总管云贵事务。从此，云贵实际上成了吴三桂的地盘。吴三桂也决心将它建成一个小独立王国。为了消除内患，他采取土司世袭与改土归流相结合的办法加强云贵土司的控制，同时，对不服从命令的土司，则以武力征服。

自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到控制云贵，近30年间，吴三桂与清廷始终进行着暗中的较量，开展着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清廷在笼络吴三桂为己所用的同时，也采取措施对其严加防范。如清廷打着宠眷有加的幌子，对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赏为额附，赐第京师，实为“人质”。不仅如此，清廷还特“赐吴三桂四满妇”，令其“凡行军必随往”。这样，清廷就把间谍派到吴三桂

内宅之中。另外又不断地从其手中收回权力，加强云贵周围地区的八旗兵力等。

吴三桂也采取了反措施。首先，吴三桂极尽能事结欢于朝廷；其次，大兴土木建筑，攫取土地；复次，纵情于声色，这样使清廷消除对吴三桂反清的疑虑，掩盖其反清活动。

吴三桂在镇藩云贵的日子里，极尽奢侈声色之能事，摆出一副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样子。而在这层表象之后，他又积极地准备着反清的密谋与活动。主要表现为：第一，招降纳叛，扩充实力；第二，收召奇材，暗结党羽；第三，准备反清的物力、财力；第四，积极联络西藏，以取得宗教界的支持；第五，分布党羽，抢占要地；第六，训练士卒，准备器械。

总之，在反清的各项活动逐步展开，已有较为充分的准备后，吴三桂密切注意清廷的动向与政局的变化，以求寻觅时机，适时地挑起反清大旗，实现其山海之盟的宿愿。

面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清廷感到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双方斗争逐渐表面化。康熙决定快刀斩乱麻，下令撤藩。

撤藩诏书颁行到云南后，吴三桂立即召集其心腹谋士与将领商讨对策。在采取两条应急措施后，吴三桂加紧了起兵的步伐。

此时的陈圆圆，风闻了吴三桂准备起兵消息后，三思而后给三桂写了一封信，为其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清基已固，清廷有备，人心思定，因此无天时、地利、人和之机，事亦无济，劝其不可轻举妄动。然而，吴三桂对此置之不理。陈圆圆见其不听自己的劝诫，反清迹象日益明朗化，她为自己思考了一条后路——出家为尼。后来她在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平定前就去世了。

经过充分的准备，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终于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再次同清军较量，“三藩之乱”正式爆发。

吴三桂起兵云南，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且致书各地，使得清朝本已安定的天下顿时大乱，出现了南北动摇的局面。吴三桂起兵的前两年中，形势发展对清廷来说十分不利，对此赵翼感叹道：

“计此二年中，叛乱四起，秦、蜀、楚、粤、闽、浙如鼎沸，选将、调兵、转饷日不暇给，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是时者也。”

除此而外，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对朝鲜、交趾也有影响，出现了“其情叵测”的局面。

吴三桂在云南举旗反清后，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从京师重地到边鄙藩国，都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以康熙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无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康熙帝在吴三桂起兵之初，迅速作出了对策，调集兵将南下御敌，但在初战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康熙帝竭尽全力，但由于吴三桂准备充分、来势凶猛，加上诸统兵将帅往往不遵令而行，且有不良行为，致使清军未能突破长江天险打入湖南，而吴三桂得以攻下长沙、岳州、固防长江以南，最后形成一种荆岳对峙的局面。

康熙对待三藩加以区别，采取孤立吴三桂，拉拢争取耿精忠、尚之信的策略，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他们二人的反正，使清朝可以专心一意地对付吴三桂了。自康熙十五年（1676年）底开始，形势有所转化，即清朝由防御转为进攻，而吴三桂则由进攻转为防守。清军抓住机会，数路出击。至康熙十

七年（1678年），年已67岁的吴三桂已失陕、闽、粤三大援军，又失江西，清兵云集湘、湖间，疆宇日蹙。在此局面下，吴三桂并未组织抵御与进击事宜，而是准备登极称帝。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正式在衡州称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此时清军已四方进逼，5个月之后，吴三桂病逝于衡州。

吴三桂，这位举反清复明大旗称雄一时的将军，终因战略策略诸方面的失误，未能实现宏愿，含恨而亡。他所打出的反清复明大旗，也随之倒了下去。

综观吴三桂一生，大致可以以两个转折点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转折点是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引清军入关，第二个转折点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发动“三藩之乱”。第一阶段的32年，是在父母的培育、舅舅的关照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步入武将行列。从他的军事生涯开始之日起，就已经站到了抗清的第一线。第二阶段，曾进行过复明尝试，并置身于清朝的统一事业之中。一方面统率关宁军进取山、陕、川、云、贵，客观上为统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在统一进程中招降纳叛、积蓄反清的兵力与财力。最后6年，是其第三阶段，发动“三藩之乱”，并称帝于衡州，数月之后病逝。

对于吴三桂一生中的重要活动作何评价？这个问题早在引清兵入关后不久即已开始，直至今日，绵延300多年，可谓众说纷纭，棺已盖而论未定。历史是复杂的，处于复杂动荡之际的吴三桂也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物，对其评价，一定要结合特定的时代特征去进行。

努尔哈赤建大清国

传说孔子到各国游学的春秋时代，陈国王宫突然掉下来一只大鹰，鹰的嘴里还有一支箭。陈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围着鹰和箭研究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到底它们是从何处来的。只好去请教孔子，孔子看了一会儿，肯定地说：“这是东方肃慎人的箭！鹰是从他们那儿飞过来的！”

肃慎人就是满族人的最早祖先，他们很早就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临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舜、禹时代，他们就和中原人民建立了联系。禹定九州，他们进贡了弓矢。周朝建立之后，肃慎人又向武王进献过箭和大鹰。孔子博学多才，所以能从箭上判断出鹰的来历。

艰苦的自然环境，形成了肃慎人勇敢顽强的性格。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肃慎人又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后汉、三国时，肃慎被称为“挹娄”；北魏时，也叫做“勿吉”；隋、唐时，又被称作“靺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以后，又改称“女真”。

靺鞨人在汉族的影响下，曾创造出灿烂的“渤海文化”。南海的昆布、柵城的豆豉、鄭颉的肥猪、率宾的良马、显州的布、沃州的绵、龙州的绸、位城的铁、卢城的稻等等，这些靺鞨特产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在历史上都很有名。

北宋徽宗执政时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地方政权——金。金后来灭了辽政权，大败北宋，掳走了徽、钦二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金迁都燕京，势力发展到黄、淮流域。进入黄、淮流域的女真人，后来绝大部分和当地的汉人融合了。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则在金设置的蒲与路、胡里改路和恤品路的管辖之下，成了以后满族的祖先。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灭金。元朝建立之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人，归元朝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元朝还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设立了征东元帅府，并把除了女真族以外的囚徒流放到奴儿干。沿途又设了许多驿站、狗站，且派兵到水达达路屯田、戍守，这些措施，加强了女真人和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

明代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海西女真大部居住在吉林扶余（伯都讷）以北的松花江一带，以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边的阿什河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则遍居于从精奇里江下游直到库页岛的整个黑龙江南北广大地域。

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对东北女真部族的管理，在他即位之初就设立了辽东都司，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女真各部纷纷归附明朝，成祖在永乐七年（1409年）设立了奴尔干都司管辖女真各部落。所以，在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时期，酋长们拿着政府颁发的官职印信，定期纳贡，并为政府保守疆界；中央有所征调，他们也随时听从，决不违期。就是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仍基本上是相安无事的，汉族人民和女真族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不仅频繁，而且热闹、融洽。

但是，明朝统治的越来越腐朽，随着女真各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部间的掠夺、动乱便多了起来。明初所设的建州卫，原在牡丹江与松花江合流处的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地方。后来由于女真人互相争斗，成化时，建州卫迁到了南边的浑河、苏子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许多建州人也迁到这儿定居下来。这儿成了建州女真强盛的基地。明朝中期以后，土地高度集中，赋

税更加繁重，皇帝们一个个深居宫中，只顾淫乐。英宗常不召见朝臣，偶然召见一次，只听听臣子们高呼“万岁”就退朝。世宗时，有个方士叫殷朝的，炼了金器百件进见，并告诉世宗：“如果您想长生不老，就应该呆在宫里不出来，不见别的人。”世宗听了很高兴，封他做太子监国。神宗皇帝当政46年，竟有30来年不临朝。熹宗皇帝就更不象话，不仅天天手持刀斧造玩具，事事全叫别人管理，而且纵容宦官魏忠贤主持政务，一帮无耻官僚，争着拜魏忠贤做“干爹”，“干爷”组成了“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阉党，横行于全国。

对于东北的女真族，明朝当时的统治者则任凭东北的将军和士兵随意鱼肉，以勒取贡物。武将中有个叫李成梁的，先后“镇辽”20余年，攻打女真奏大捷者就有10次之多，很受朝廷的赏识。他的官越做越大，因此胃口也越来越大，将辽东几乎所有的钱财都搜进了自己的腰包。

朝廷对女真人的压迫越来越严重，首先在政治上进行严厉的压迫。自从建州后将女真人迁到浑河岸边的赫图阿拉之后，朝廷就筑了1700里的辽东边墙，挡住了女真和西部少数民族部落蒙古兀良哈的来路。另外女真酋长去世，朝廷也不再赐诏书慰问；当女真人来朝进贡时还减少赏赐以示轻蔑他们。所以，女真人都想造反。成化二年（1466年），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造了反，朝廷发兵5万讨伐，杀了董山之后，还将其弟褚安发配到福建，使他死在戍所。随后，又筑了抚顺、清河、阳等寨堡，对女真严加镇压。

在经济上，明朝也是尽量压榨女真人民。虽说建州女真生产较为发达，早在猛哥帖木耳时已用牛耕，移居赫图阿拉以后，更是到处开垦荒地，连山上也种了庄稼。后来，手工业也不断发展，从事银、铁、革、木制作的人逐渐增多，而且大量引进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农业耕作多用汉人，织锦刺绣等更全是汉人来做。但是，总的说来，女真人的生产水平还不高，在各种日用品方面，很大一部分还是靠明朝方面的贸易供给。女真人、蒙古人需要汉人的粮、种、盐、绢、缎、布、蜜、蜡、锅、铧、铲、剪、针等。有时，蒙古人一次就售马千匹，买粮三百车；女真人一次交易，就换铧千件之多！因此，永乐四年（1406年）开设的3个“马市”贸易市场远不够用。宪宗时，女真屡请开市，最后神宗同意，增开抚顺、清河、阳、宽甸、义州等堡，但同时又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

首先，卡货物：神宗以前，就常不许汉人卖出铧、铲、剪、针；神宗时，甚至严格控制了盐、米、布匹的上市，逼得女真酋长想拿儿子作人质，请求出售给他们必需的货物。

第二，榨油水：官吏通过所谓验收、征税，大加盘剥，大发横财。

第三，不讲信用：市场时开时闭，造成女真人经济上的损失。万历三十七、八两年（1609年、1610年），努尔哈赤部的人参，因朝廷关闭马市而卖不掉，一次就烂掉了十几万斤！女真人的损失惨重。

第四，只许女真人跟明朝“贸易”，不许他们去朝鲜做生意，叫他们“禁绝外交”。

为了削弱女真人的反抗，朝廷还采用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政策。那个拚命掠夺辽东财产的李成梁，就极力加深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矛盾。

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派兵帮助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打阿台。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失岂能见死不救？二人急忙领

兵去阿台所在的古埒城外，叫尼堪外兰先不要攻打阿台，让他去劝说阿台投降。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去劝说阿台，可是他还是不降，而且亲自督战守城。恼羞成怒的尼堪外兰便许下诺言：“谁杀阿台，谁就当古埒城主！”

城中一些贪心的人，听他这么一说，便杀了阿台向明军投降，没想到明军却来了个大屠杀，把入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塔失和叫场也乱兵砍死。

这一冤案，由明朝的李成梁一手造成，正成了努尔哈赤造反的导火索。

努尔哈赤听说父、祖死后，非常悲痛，质问明朝官员为什么欺骗他们？朝廷自知理亏，给了他 30 道敕书、30 匹马表示歉意，又授给他建州左卫都督、都督佥事加龙虎将军的衔名（爵至正二品）。努尔哈赤当时力量有限，只好忍住。

但是，明朝统治者继续执行分化、压迫女真人的整个政策。努尔哈赤也就一面接受封赏，一面用：“我只要抓住仇人的尼堪外兰就心满意足了。”的话来转移明朝的注意力。

万历十一年（1583 年）5 月，25 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以父亲遗留下来的 13 副铠甲起兵了。他首先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努尔哈赤旗开得胜，尼堪外兰逃跑了，缴获兵百人、甲 13 副。随后，他又领兵追到嘉班城、抚顺所，尼堪外兰则又投奔鄂勒琿城去了。这就为努尔哈赤统一其间各部提供了借口。这样，从 1584 年开始，努尔哈赤发动了大规模的女真族统一战争。

当时，在原来建州的地区，女真族早已经分裂成许多小的部落，各部落之间互相纷争，甚至骨肉相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努尔哈赤具有统一女真各部的条件和才能。“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努尔哈赤时刻不忘这两手。他跟各寨主大搞联盟又用优待俘虏、下人的办法瓦解敌军、团结内部，同时，还注意以苦战血战为基础，一点一滴地扩大统一的战果。

万历十二年（1584 年）六月，努尔哈赤攻打董鄂部的翁鄂洛城。他正在房顶上向城里射箭，城里有个叫鄂尔果的敌人，一箭发来，射穿了他的头盔，入肉一指来深，血流至足，他拔出这枝箭刚射死一个敌人，不料洛科又对他暗射一箭，射中了他的脖子根，拔出箭看，箭头都像铁钩一样卷曲了，还带出了两块肉。部下要搀他下房，他恐乱了军心，坚持自己下，结果，一下来就晕倒过去。养好伤，努尔哈赤再次攻城，抓到了鄂尔果和洛科，部下主张杀掉，他却坚持说：“这样的人，死于战阵还可惜哩，为什么要杀？”吩咐赏给牛录之官，统率 300 人。努尔哈赤这种招数，在征服人心中，奏了良效，凡是被他收服的人，都肯尽心为他效力。

万历十三年（1585 年）二月，努尔哈赤发起太兰岗战役。战前，努尔哈赤率甲士 25 名、步兵 50 名，攻打界藩寨，没有取得胜利。归途中，没想到界藩寨长联合另一个寨长带领 400 名士兵追了过来；敌人追到太兰岗之野，阵式刚刚摆开，纳申、巴穆尼便同时向他冲来。努尔哈赤单骑还击纳申，纳申一刀就砍断了他的马鞭。但他毫不畏缩，挥刀一击，砍断了纳申的胳膊，纳申坠马而死。努尔哈赤又射死巴穆尼，才压住了阵脚。手下的士兵问他：“马疲了，怎么办？”他说：“你们下马，假装用箭袋拂雪，像拾箭的样子，然后，从容翻过岭去休息。”说完之后，他自己只率 7 人露了甲冑站着，形同设有伏兵，吓得敌人甚至不敢收拾他们的首领纳申的尸体，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叫喊：“快跑啊，有埋伏。”努尔哈赤带领士兵安全撤退下去。这一仗充分体现了努尔哈赤苦战巧战的精神。

努尔哈赤就这样一仗一仗地坚持打下来，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前，不但早已杀了仇人尼堪外兰，而且统一了建州各部，制定了国家制度，1589年还称了王。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粉碎了叶赫、哈达、乌拉等九部联军3万人的进攻，并完全统一了长白山部。

接着努尔哈赤又花了20来年的时间，用征战和招抚的办法，统一了叶赫以外的扈伦各部，以及东海女真的许多部属。将士出征之前，他都要告诫他们，注意保护人口和财产，要注意收买人心，不要树敌太多。这一点体现了努尔哈赤远大的政治眼光。

努尔哈赤征服的地区越来越大，他处在辽东地区，蒙古、朝鲜、明朝，对努尔哈赤构成了三角包围之势，因此，努尔哈赤很重视建立统一战线避免自己腹背受敌。他决定先联合蒙古。为了联合蒙古，他不念旧仇，主动搞好关系。蒙古科尔沁部曾参加过“九国（部）联军”，后来又帮助布占泰攻打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竟主动遣使与科尔沁部的莽古斯、明安、翁果岱通好，这样宽广的政治胸怀使他的盟友越来越多。对归附而来的人，一律优待以礼。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贝勒明安的女儿为妻。天启元年，喀尔喀蒙古的一个酋长带领600人来降，努尔哈赤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把女儿嫁给这位酋长作妻子。有了这样的先例之后，以前对努尔哈赤抱有敌意的女真部落和蒙古部落得到良好的接待，纷纷来投。天启元年（1621年），光蒙古的归附者，就被编了76牛录。努尔哈赤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以前，女真人的生产和军事行动，各依族和寨进行编制，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头目称为“牛录（箭）额真（主）”。实力壮大后，努尔哈赤便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头目。5个牛录置一“甲喇额真”，5个甲喇额真就组编成一个“固山（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只有黄、红、蓝、白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设了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四旗，就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旗了。八旗制度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它有力地加强了努尔哈赤的权力。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的子侄是各旗的统帅（称“和硕贝勒”或“固山贝勒”）。在八旗之外，每牛录又选出精壮17人组成亲军“巴牙喇”，加强王权。不久，他们又设立“大臣”等一些官职，并且每5天上朝一次处理政务。这样一来，努尔哈赤已经成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领导者了。他统一了辽东女真各族，开始把眼光转到山海关以外，准备与明朝一决高低了。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下令重修赫图阿拉城。3年之后新城修好，努尔哈赤把宫殿迁到城里，不久，便停止向明朝进贡。万历四十四年一月，努尔哈赤宣布建立“大金”国，自己即位称可汗。群臣上表尊称努尔哈赤为“覆着列国英明皇帝”，改年号为“天命”。后金政权建立了。这就是后来的“大清”政权的前身。

后金政权建立后的两年，努尔哈赤趁着明万历皇帝30来年没临朝，政治腐败到极点，矿监税使横征全国，边备废弛，兵马羸弱的时机，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以“七大恨”誓师，向明朝廷正式揭开了战幕。

“七大恨”指责朝廷不尊重汉区与建州的边界的划分（即不尊重努尔哈赤），并且支持叶赫部抗拒努尔哈赤的统一。

“七大恨”控诉了朝廷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一下子便激起了女真人反抗

明朝统治的民族情绪。

在这之前，努尔哈赤已作了充分的舆论与战争的准备；“七大恨”誓师时，有诸贝勒大臣统步、骑兵2万人参加；誓师完毕，这支兵马，便立即向西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东州、马根单两城。随后，努尔哈赤就乘夜雨刚晴，派突击队化装成商人先出发，以重兵跟着潜进，突至抚顺城下，致书劝降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并向他封官许愿。

李永芳在6年前就曾见过努尔哈赤，接受过他的赠书，如今看了这信，更加没有抵抗决心了，一面站在城南门上请降，一面叫人准备守城的东西如灰瓶、挡牌、盾车之类。努尔哈赤见李既无抵抗的决心，又无抵抗的准备，就命令架云梯攻城，杀了守备王命印，李永芳看守城无望，于是冠带整齐乘马出降了。努尔哈赤也兑现自己的许诺，授李永芳为三等副将，依旧率领原来人马，还把亲孙女赏给李永芳做妻子。努尔哈赤还命令将“七大恨”的表文和一些银钱赏给关里来的商人，叫他们带回去扩大影响。

努尔哈赤第一次夺取明朝“边城”，第一次招降明朝“边将”的战役，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全部地胜利了。从此以后，努尔哈赤进入了与明朝正面作战的阶段。

攻下抚顺之后，努尔哈赤乘胜攻击，这年七月，进兵攻清河城。清河将领邹储贤，带兵1万固守清河，后金军架云梯冒矢石强行攻城，守兵不支，城破之后，储贤被杀。努尔哈赤拿下抚顺、清河等城，一下子就俘获人、畜30万，从此，就更不把明朝放在眼里。他要求朝廷正式承认他为王，并向他输彩币、纳金银。朝廷没答复，他于是下令在界藩山筑城，作为根据地，摆开了与明军大战的架势。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1619年，杨镐分兵4路，由4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对外号称47万。杨镐坐镇沈阳，负责全面指挥任务。

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与明军相比数量很少，合起来不过6万多。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不免有点害怕，来找努尔哈赤，要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别怕，管他几路来，我就是一路去。”这是他的得力大将，原来的明朝将领李永芳给他提出的一个有效建议。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

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但是他经常急躁冒进。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锐部队攻打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看到杜松的兵力已经分散，十分高兴，他按照原订计划，迅速将八旗兵的全部主力6万余人，全倾注到了杜松一支明军的方向。努尔哈赤到了界藩山之东以后，便命代善、皇太极二旗兵马增援界藩守军，自己率其余六旗4.5万余人猛攻萨尔浒大营。大营中，只有监军张铨和一些偏裨末将，全靠着枪、炮等火器御守。刚一接战，天气突变，昏暗得几乎咫尺不见，明军只好点着火炬守山，金兵从暗处仰攻，借柳林以避火器，攻击不久，很快战胜了明军，拿下了萨尔浒山的大营，然后，迅速合兵回救吉林崖。在吉林

崖山腰与后金骑兵相持不下的杜松军，先是遭到渡过浑河上山杀来的代善和皇太极的夹攻，现在不仅接到大营失守的消息，而且又见努尔哈赤六旗大军统统杀来，不禁锐气大挫，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杜松和王宣、赵梦麟等将官，全部阵亡；部卒们更是尸横山野，“血流成渠”，剩下不多的余众，狂奔了 10 公里，到天色已黑的时候，方才止住。这样，明军最有战斗力的一路人马很快覆灭了。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 20 公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立即向开原马林一路发起攻击。马林将军队全部布置在尚间崖，环营挖掘壕沟，壕外前列火器、后布骑兵，派潘宗颜带领一军守斐芬山，派龚念遂一军守住翰珲鄂谟，各相距大约数里，都列大军拒骑兵。努尔哈赤先集中全力破龚念遂军，随前后夹击攻破尚间崖，拒者尽死，叶赫兵尽逃，马林仅仅自己得以逃脱。尚间崖破后，后金军下马仰攻斐芬山，潘宗颜的军队也全被消灭了。明朝的左翼北路大军，也在一天之内被全歼了。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恶耗，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

南路明军，由刘綎领着，从宽甸口出发，进栋鄂路，一路稳扎稳打，打到离赫图阿拉只有 50 里的腹地，只等着朝鲜援兵会合齐进了。努尔哈赤一面急调兵回守，一面派后金兵持杜松令箭，乔装入刘营，说杜松已胜，杜军已逼赫城，催刘速进。路窄，刘綎分兵为四路，自己率前军进入阿布达里岗，皇太极居高击下，代善兵假冒杜松军穿着明军的衣甲诈入刘营夹攻。刘綎力战而死，余军被瓦解之后，全被消灭掉了。

这样在短短五六日之内，明军三路惨败，军士被歼 4.5 万余人。萨尔浒一战，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军队的实力，充分地暴露了明朝军队的致命弱点，奠定了后金渐强渐胜的基础。从此，后金眼里更无明朝，六月攻下开原，七月拿下铁岭，八月统一了叶赫部，明廷渐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萨尔浒战后，朝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廷弼赴任后，斩逃将、收流民、严肃军令，不轻易出战、分兵把守 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诸口，又实行三路把守的策略，以广宁巡抚统陆军，以天津、登莱两巡抚统海军，使后金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相持着大约有一年的时间。

但是不久，熊廷弼就被朝中大臣上疏弹劾，朝廷罢了他的官。努尔哈赤趁机进攻东北重镇沈阳，一举拿下了沈阳，守兵被消灭了大半，连守城总兵贺世贤也被杀掉。

攻克沈阳之后 5 天，努尔哈赤再指挥全部人马进攻辽阳，很快攻克辽阳及河东 50 寨。这样，辽东地区全部为后金所有了。

就在明朝连战连败，政权马上就要灭亡的时候，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抗金英雄。

曾做过福建延平县知县的袁崇焕，喜欢谈论军事，每每遇见退役将卒，总要打听关塞军事，弄清控卫关塞的情形，以把守关塞的专家自许。广宁之败时，他正值有事的时候，不久，便单独出山海关，视察关外详情，夜里往往四鼓之时才返回住处。御史侯洵也算是个伯乐，建议重用他，他于是被破格录用为兵部金事，监军关外，临行还拜访了熊廷弼，熊廷弼对他很器重。

袁崇焕慷慨有志，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失守，大量士兵和百姓纷纷逃入关内，有人主张退守山海关。他单骑出关考察形势，考察归来，他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报告说：“只要给我兵马和军饷钱粮，我就能担负起防守辽东的大任。”当时朝廷里惊魂未定，束手无策，正愁没人敢承担防守大任，袁崇焕自告奋勇，真是求之不得，立即越级提升，命令他监军关外。

袁崇焕到山海关上任不久，有一天，辽东经略（主管辽东的官员）王在晋派他到关外 35 公里的前屯去安置从广宁流落来的百姓。他星夜出发，孤身一人在虎狼经常出没、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中走了大半夜，天亮之前赶到前屯。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和百姓都佩服袁崇焕的胆量，王在晋也很欣赏他的胆略和气魄。但是袁崇焕不同意王在晋死守山海关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坚守关外，才能保卫关内，主张驻兵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

宁远西连长城，是辽西走廊的咽喉要地。袁崇焕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下，重修宁远城。宁远的防御一巩固，辽东的流亡百姓都集中到这里来，关内的商人也前来做买卖。宁远成了商业繁荣、防御坚固的关外重镇。

袁崇焕在宁远筑起三丈二尺高、二丈宽的城墙，装备了各种火器、火炮。孙承宗还派了几支人马分驻在宁远附近的锦州、松山等地方，声援宁远。

袁崇焕号令严明，受到军民的爱戴。关外各地的商人听说宁远防守巩固，从四面八方拥到宁远来。辽东的危急局面很快扭转过来。

正当孙承宗、袁崇焕守卫辽东有了进展的时候，却遭到魏忠贤的猜忌。魏忠贤唆使阉党说了孙承宗不少坏话，孙承宗被迫离职。

魏忠贤排挤了孙承宗，派了他们的同党高第指挥辽东军事。高第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后金军太厉害，关外没法防守，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

努尔哈赤看透了高第的怯懦无能。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他率军渡过辽河，直抵宁远城下。他先派人进宁远向袁崇焕劝降，袁崇焕毫不动摇。回答说：“说什么 30 万大军，我修建宁远城的时候就下决心死守，哪有投降的道理呢？”说罢，召集大将桂满，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商量对策，把守城军民集中起来。他在军前慷慨激昂，鼓励军民誓死守城，广大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誓死守城。誓师完毕，他把城外的百姓和粮食移入城内，坚壁清野，又命令军民偃旗息鼓，专等后金兵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兵发起进攻。一阵鼓响之后，城头上军民把火药罐、礮石纷纷投下，又放火烧敌人的战车。后金军屡攻不下，这时候天渐渐黑了，只好暂停攻城。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次带大军进攻，大批后金兵士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石、炮火，猛烈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兵倒下一批，又来一批。情况相当紧急，袁崇焕下令动用大炮向后金军发射。炮声响处，只见一团火焰，后金兵士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后撤。

第三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了望台，沉着地监视后金的行动。直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才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使后金军受到更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撤退。

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乘胜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 15 公里，才得胜回城，金兵被消灭了许多。

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跟他的部下说：“我从 25 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他又气又恨加上伤势越

来越重，拖了几天，就咽了气。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接替他做了后金大汗。

皇太极继续指挥军队攻打宁远，可总也攻不下来，反而损失了不少人马。这时有人建议，明朝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如果使用反间计，也许能除掉袁崇焕。正在袁崇焕抗金的时候，北京城里捉住好几个奸细，一个叫文瑞的说袁崇焕曾让他带信给后金军，一个工匠说他知道袁督师想谋反。说来真怪，这些奸细招供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崇祯皇帝本来就多疑，听了太监报告，信以为真，便以商议军饷为名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刚进皇宫，崇祯皇帝就以叛国大罪下令把他逮捕了。皇太极见袁崇焕被捕，大功告成，便把军队撤回沈阳。

袁崇焕被捕后，他的部将祖大寿十分惊惧，率领军队逃出山海关，袁军也跟着走散了 1500 多人。崇祯皇帝没办法，只好叫狱中的袁崇焕写亲笔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信，捧在手里，大哭不止，全军上下哭声震天。祖大寿 80 高龄的老母亲对他说：“不如杀敌立功，也许还能赎督师一命。”因此全军振奋，决心杀敌立功。

但是崇祯皇帝认定袁崇焕是叛国贼，无论怎么说，他都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到了第二年，崇祯帝终于下令把袁崇焕杀害。

皇太极用反间计除了对手袁崇焕，退兵回到盛京。打那以后，后金越来越强大。到了公元 1635 年，皇太极把女真改称满洲；又过了一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叫清。这就是清太宗。

清初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有之。周宣王时有民谣曰：“月将升，日将没，几亡周国。”因为内容含有讥讽的意思，宣王生疑，怒杀了許多人，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到了清代，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烈。

入清以后，随着文字狱的泛滥，“字祸”、“史狱”、“书祸”之类的新名目纷纷出现了，特别是因撰写明史而得罪的，在清初特别多。

清代的文字狱，实际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及实行愚民政策的一种残酷手段。文字狱是十分残酷的，常常一案即牵连多人，甚至几百人、上千人遭祸。由于清代大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正如龚自珍《咏史诗》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当然，清代文字狱并非整个清代都是这么残酷。庄廷《明史稿》案、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都发生在康熙朝。雍正朝发生过查嗣庭《江西考题日记》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曾静、吕留良之狱，陆生楠《道鉴论》案等等。乾隆朝文字狱案更多而惨，主要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前。乾隆四十七年以后，虽然仍时有发生，但处置得已是较轻，也较宽了，说明清代处理文字狱案的政策并非前后一致，到清朝中期以后已有了变化，变得稍宽松了一些。

清朝初期受文字狱迫害最多的是历史学家。历史并非纯学术领域，历史本身虽然是客观的，但如何记述，有个立场问题；如何评论，那更容易透露出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因此，写历史常常得罪当权者。作为文字狱一种表现形式的史狱，绝大多数都与当时的政治矛盾、政治斗争有关。当然，统治者有时也会牵强附会地说作者指桑骂槐，搞影射攻击。因此把史学家投入监狱。史狱在清初非常多，就是这个原因。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是历史上第一个注意文字狱的学者，他比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南宋及明初的文字狱，把诸如“诗案”、“史狱”之类的罪案作了一个抽象的概括，称之为“文字之祸”。“文字之祸”四个字，概括了这类案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因文字之故，构成了罪案。

清朝最早的一个文字狱，是一个和尚引起的。

顺治四年（1647）年冬，把守南京城门的清兵盘查了一个名叫函可的广东和尚，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南明福王书信和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在审讯的过程中，函可受到严刑拷打，夹棍折了又折，但他始终坚持书信和书稿是自己写的，与他人无涉。年底，摄政王多尔袞命将函可关入北京刑部大狱。第二年4月，将他流放到了沈阳。清朝血腥的文字狱史，就这样翻开了第一页。

顺治十六年（1659）冬，函可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死去。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他留下了洋溢着浩然正气和不屈精神的大量诗作，即《千山诗集》，在他死后40多年才得以出版。又过了70余年，《千山诗集》被乾隆帝发现，认为函可藐视清朝下令将《千山诗集》查禁销毁。死去100多年的函可也未能逃过这场浩劫，他在沈阳住过的庙宇，以及为他所立的砖塔、碑刻字迹都被拆毁无遗。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到顺治十八年（1661）平西王吴三桂统率的清军深入缅甸，消灭南明政权，经过近20年的军事镇压，清朝对全国的统

治才真正得以实现。这中间，烽烟四起，清政府忙着用兵打仗，哪有精力去检查、挑剔汉族士大夫的文字呢？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是大学士刚林举发的。刚林是清朝第一名满族举人，汉化程度很高。此案影响虽有限，但它表明满洲统治集团开始去追究汉人文字中的疏忽了。顺治帝亲政以后，又搞了科场案和奏销案等，对汉族知识分子加强了控制。

顺治十八年正月，24岁的顺治皇帝病故，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臣，扶助幼主。幼主就是康熙皇帝，年仅8岁，政柄操在四辅臣，特别是专横跋扈的鳌拜手里。四辅臣时期，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史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 明史狱。

庄廷 明史案是清代初年的一件较大的文字狱案。牵连人极多，被抓者数百人，死者70余人。

庄廷 ，字子襄，湖州乌程人。其父庄允城是当地一个大户。庄廷 从小就很有才气。但不幸眼睛瞎了。庄氏与明代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的后代为邻，他的《明书》稿即从朱国祯后人那里买来的。

朱国祯在明末天启年间官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博学多闻，有杰出的史学才能，生前著述颇多。他所作的明书大事记、大政记、大训记，都曾在明代天启年间刊刻。晚年编纂《明书》一部。朱氏后代，家境渐渐衰落，由于贫穷，将朱国祯《明书》史稿以一千金卖给同乡庄允城之子庄廷 。

庄廷 买得朱国祯《明书》史稿后，便以这部书稿为基础，四处招揽宾客编纂《明书》，对朱国祯原来搜集的史料进行修改整理。书成后取名《明史辑略》共约100多卷。

书编成后刚刚刊刻一部分，庄廷 病逝。其父庄允城为纪念儿子，继续出资刊刻此书。

庄氏明史编成后，请当地名流，进士李令哲为之作序。刻书期间，庄廷 为扩大其史书的影响，联络当地名士茅元铭、吴炎、吴楚、吴元铭、吴之鏞、张隽、唐元楼、严云起、韦全祐、蒋麟徵、潘柽章等16人，参与修订，名字一一列在书中。此外，庄氏还曾邀请当地举人查继佐（字伊璜）、贡生范骧及陆圻等三人也署上名字。三人以未参与其事，怕招惹是非，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将此事报呈浙江学道。

庄氏之明史所用的基本资料，都是朱国祯所记及搜集的明朝史实。朱国祯系明朝重臣，所录史实自然较为真切；同时，他的文字也必然有其倾向性。这些史料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自然是非常忌讳的。另外，清初若干年内，江南还有不少人集社结盟暗中反抗清朝统治。

当时庄廷 家乡所在的湖州已被列为重点查禁地区。查继佐三人呈报后，学道胡尚衡即批湖州府学负责查报此事。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为抢头功，赶紧买刻书一部，从书中摘出数十条不妥文字。然后，将所余刻书三部呈送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衙门，以为此事便算完结了。

谁知此时又出了个因贪赃枉法被解任的吴之荣，他为了乘机诈取一份巨额钱财，将案子闹大了。吴之荣任归安县令3年，以敲诈手段诈取数十万两银子。为乡人告发入狱，后遇赦削为平民。吴之荣因听说庄氏《明书》中有不妥文字也赶忙买书一部，借此敲诈庄允城，谁知此时庄允城已暗中馈送数千金给湖州知府陈永命。吴之荣持书到庄允城家索贿，庄允城以为有知府陈永命作靠山，没有答应吴之荣的要求。吴之荣不甘心，又再次至庄家索贿，希望得到些馈赠以挽回面子。庄允城忌恨吴之荣，不仅不给，反而到官府去

告发吴之荣，官府于是下令立将吴之荣押送出境。吴之荣见诈庄氏不成，于是又想从当地富豪朱佑明家敲诈一些钱财。

朱佑明祖、父辈本是木匠出身，朱佑明巨富之后，费数万金造了一座大宅院，新屋造成后，朱佑明托人买来朱相国（国祯）家堂匾一张，朱佑明将匾挂在堂中。吴之荣去诈朱佑明，就是因为这块匾，说他与明臣朱国祯有牵连，至今还挂他的匾。朱佑明自恃财大势大，有靠山，拒不应允。吴之荣连续到朱、庄二家索银，两家男人回避，妇女数百十人群出辱骂。朱、庄贿赂守道派来的官兵衙役，立时将吴之荣逐出境外，直过吴江。

吴之荣私愤难消，必欲雪恨。于是进京，摘庄氏史书中不尊敬清朝的文字，直接向刑部告状。案告至刑部，康熙元年冬便差满官到湖州去调查此事。于是，牵连数百人之案即由此开始了。

康熙朝官员到湖州查案，官员押解庄允城到京审问。冬末，庄允城死于狱中。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二十二日，朝廷官员一早到湖州闭城捉拿与此书有关者，李令哲曾经为《明书》写过序言，其父子均被拘拿，又将其兄弟、祖孙、奴仆、内外男女人口数百人，一起抓获，当时有拜年的亲戚及邻舍来观看者，也同时抓获。与此同时，朱、庄两家也被包围，男女家丁，仆从夫妇都被一古脑儿地抓住了，共数百人。

朱佑明与朱国祯同姓而已，朱佑明因挂了朱国祯的堂匾，结果，朱佑明处以凌迟，其三子均处斩。朱氏妻奴配给旗下为奴，全家家产籍没。

接着，吴之荣又告镇浙将军柯奎受贿隐瞒逆书罪，柯奎无法隐讳。柯奎以满人不识汉字，免死，革其将军职归旗为民。吴之荣又告陈永命受庄氏贿赂包庇庄氏，陈永命本是旗人，听说吴之荣告发，惧罪自缢死于店中。官府将其尸体运到杭州，磔尸三十六块，其弟陈永赖为江宁知县，亦连罪被斩，妻子配给旗下为奴。卖书者王云蛟处斩。谭希闵虽任湖州太守半月，根本不知此案的详情，但也与推官李焕宁，以陷匿罪处绞，死于钱塘门外。

此案中受牵连处死的还有：

张隼，字非仲。曾为庄氏所召，作明代理学诸人传。庄史案未发时，已逃入僧舍，时年已70余。被抓获时，谈笑自若，不久被处死。

董二酉，少有神童之名，学问渊博，书法也很精妙。庄氏史稿案发时，已死了三年多，仍被开棺戮尸，其子濯万，9岁能诗，曾作五言感怀古诗4章，后处斩。

潘恂章（字力田）、吴炎（字赤溟），皆吴江人。二人平日闭门读书，也私著《明史》1部。庄廷 时曾请二位参加修撰，潘、吴未应请。庄氏也将两位名字列入参订之中。案发后，两县令亲自上门缉捕。两人非常镇定，到杭州后，见到两部官员，痛骂不屈，后皆被斩。

蒋麟徵，字西宿，庄氏纂史时召请编纂，初不愿意去，为贫所累，不得已而赴命。案发后，亦同时遭难。

茅鼎叔，字元铭，纂史稿仅数月，因史稿刊列其名，全家抄没，被绞死。

吴之镛、吴之铭兄弟，湖州名士，因参与史稿校订，均被斩。

韦全社，字元介，其弟全祐，字次申，案发时韦全社已卒，韦全祐被斩。

李继白，乙未进士，为苏州浒墅关专卖主事，听说书坊有庄氏《明史略辑》一书，派人买了一部，案发时，李继白已调入京城，但也以购买逆书获罪，立斩于市。卖书商及派去买书的人，也同时斩于杭州。

刻工汤达甫、印刷匠李祥甫，处斩。

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均为当地名士。

查继佐、海宁人，字伊璜，明末举人。其著作有《班汉史论》陆圻，钱塘人，字丽京，顺治时贡生。著有《从同集》、《旃凤堂集》、《西陵新语》、《新妇谱》等。

范骧，海宁人，字文白，有《默庵集》。

庄氏史稿案最初起于吴之荣。吴之荣除了向庄氏取贿不获而忌恨外，吴之荣欲想得到查继佐家的歌女，不得，于是吴之荣亦恨查氏。

康熙元年六月，吴之荣进京告发。十一月，查、陆、范三人被执，于十二月解京问罪。康熙二年正月，查、陆、范三家老幼、妇女、奴仆等均被抓获，家产查封。查、陆、范三家被拘者，共 176 人。直到四月天热，方许回家居住，然只开几间房子，其他房产仍封固。

在押期间，查、陆、范三家屡托人向官员出资行贿，方得宽释。直到庄允城在京服毒自杀、庄廷 发墓碎尸，案子了结，才将查、陆、范三人及全家免罪释放。

查、陆、范获释后，朝廷以三家首举有功，将庄、朱二家之家产，一半给告发人吴之荣，一半分给查、陆、范三家。陆圻不愿接受，于是尽归查、范二家及吴之荣。

吴之荣因告首有功，果然名利双收，不仅得朱佑明巨万之产业，并重新被起用，官至右佾都。但于康熙三年夏，发生恶疾，痛苦万状，不治而死。

陆丽京在被拘捕时，曾告诫二子曰：“你们今后只要孝顺母亲，谨守礼仪，终身不必读书。获释后经过两年对家人安顿。于康熙六年（丁未）春，削发为僧，不知所终。

查伊璜，自幼才华横溢，风情潇洒。他之所以获得释放，得力于 20 多年结识的落魄读书人吴六奇。吴沦落为乞丐时，查伊璜曾收留了他，并发给他一些盘缠，送回广东。后来吴六奇以其才在平南王麾下做了两广提督，事过 20 余年后，才与查伊璜再见面。此次查伊璜遭祸后，曾求吴六奇相助，吴六奇即请平南王为他打通关节，查伊璜获免。

查伊璜获释后，放情诗酒，买了美女 12 名，教他们歌舞。经常在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观者醉心。查伊璜夫人也妙解音律，亲自为家妓作曲填词教她们唱曲。

庄氏史稿案，遭祸者数十家，牵连者近千人，死者 70 余人，十分悲惨。此案从发始起，前后两年，兵丁围困、抄斩杀戮，趁火打劫，偷盗拐骗，持续发生。这是清朝第一件文字狱案，也是清代文字狱案中较大的一次杀戮案。这次文字狱案，是清代统治者进行思想文化专政政策的总开端，也是对汉族进行思想文化压迫的总信号。此后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接连不断，其中汉人遭害者不计其数。可想而知，清朝 300 多年，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禁锢是多么严酷了。

这次案件，虽然数十家遭祸，有的被杀，有的幸免，其中也有些插曲或传闻，值得一记，以使人们了解此案始末的一些更全面情况。

庄廷 在案发前已死去，其父庄允城死在狱中，其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廷钺幼子也被斩。主犯庄廷 ，被开棺戮尸。

当时受祸各家，为保存血脉将年龄小的孩子改名托人藏匿的，也有不少。

此外还有几人，虽也参加了庄氏史稿修撰，但却因偶然原因，得以幸免。

遇难者也有，幸免者也有。可见当时参加修史的人很多，都以为是一件

荣光的事。由于统治者极其残暴，在受难者当中，受冤者也实在不少，只是鉴于统治者及各级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也没人敢辩解。比如吴之荣，本系赃官，一向诈财，告发庄、朱，也是为索财不与，挟嫌私愤，结果反而以朱、庄家产之半赏之，并起用加官，完全是是非不分。统治者为了实行文化统治、思想禁锢，是不择手段的。原本无公理可言。

《明史》案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它激起的波澜久久不能平息。当时很有些心术不良的恶棍效法吴之荣，专挑别人著作中的纰漏，指为“逆书”，漫天索贿。到后来花样愈来愈新，手法也愈出愈巧，歹徒们索性偷偷炮制出一本逆书，想要诈谁的银子，便把他的尊姓大名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子最大、心也最黑了。他们刻印了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不下七百名，几乎把大江南北的名士巨室网罗殆尽。康熙六年（1667）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二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到官，经刑部审理，真相大白。这一年闰四月沈天甫等四人被押赴菜市口处斩。

沈天甫几个恶棍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表明清统治者也有所顾虑。在处理沈案的同时，御史田六善上疏说，近来有一批奸民专干诬陷讹诈的勾当，他建议皇上颁发谕旨，今后谁再敢栽害别人，一概“依律反坐”。康熙帝表示同意。但从此后的情况看，借逆书搞讹诈之风并没有很快平息下来。顾炎武的例子，就很典型。庄廷 主持编《明史》时，见顾炎武名气大，派说客请他列名，但顾炎武看不起他，谢绝了。庄氏史案发之后，顾炎武没被牵连进去，他自觉很幸运。不料康熙七年（1668）二月间他正安居北京，却莫名其妙地被千里之外的一起文字狱卷入了。这件案子与沈天甫案如出一辙，造逆书的叫姜元衡，中过进士，点了翰林，回到老家山东把沈天甫那本书剪掉了200页，改名为《启祯集》，告到官府，说是昆山顾炎武搜辑发刻的。山东方面请旨逮问顾炎武，顾炎武三月离京南下，自去济南投案。当堂对簿，姜元衡哪里是顾炎武的对手，加以朝中有人同情顾炎武，替他说情，这年九月他被保释出狱。

当顾炎武陷入文字狱时，康熙帝亲政了。康熙八年（1669）五月，这个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结束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之势立即得到了控制。康熙十二年（1673）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1678）特开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康熙帝期望通过上面的措施争取海内敌视清朝的知识分子与他合作。正当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齐全面紧张的关头，康熙帝能毅然决然地改弦更张，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缓和的政策，是很不容易的。

放宽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成了对汉族知识分子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康熙清除鳌拜，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勃发，这40几年中间，虽在二十一年（1682）发生过一起比较著名的朱方旦案，把一个极有真知灼见的朱方旦杀掉了，但对知识界似乎没有什么震动，怀柔 and 宽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仍在继续贯彻之中。当时的思想界相当活跃，不少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了。此外，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顾炎武记了庄氏《明史》案，记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公然号召汉

族人起来造满州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1671），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康熙帝的晚年还是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大狱。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对官修《明史》有所不满，想独力私撰一部《明史》，他的才识也足以担当此任。梁启超讲过，有清一代史家作者如林，让他佩服的只有戴名世和章学诚二人而已。然而，戴名世还没有着手写明史，大祸就突然临头了。康熙五十年十月，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语多狂悖”，康熙帝命严加审讯。《南山集》案与当时诸王竞争储位不无关系。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江南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鹏翮互相攻击，趋于白热化，噶礼借《南山集》案兴风作浪，以陷害政敌，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结案时刑部等衙门的判决十分严厉：戴名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已故的方孝标应照大逆律锉尸，戴、方两族俱照律连坐，为《南山集》写序、刊刻以至贩卖者均依律治罪……。看来，法司要兴动有如庄氏史案那样的大狱了，幸亏康熙帝很慎重，最终除戴名世处斩之外，康熙帝对受株连者都做了从宽处置。康熙帝批准刑部追究戴名世等人的文字之责，最后竟将戴名世处死，毕竟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总的说来，顺、康两朝 80 年，除四辅臣擅政的短短几年外，清统治者还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的构陷和倾轧。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1723—1735）文字狱多了起来，现在能统计到的有近 20 個案子。雍正朝的文字狱，以雍正六年（1728）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几起著名的文字狱与康熙朝的文字狱有所不同，一般不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性质。从吕留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汉人的民族意识上。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病逝于西郊的畅春园。官书记载，帝弥留之际，下诏传立于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照这种说法，帝位的授受很清楚，雍正帝得位没有问题。然而，当时民间的谣言却特别多，许多神秘的宫闱秘闻不胫而走，有的说康熙病重，胤禛进了碗参汤，皇上就驾崩了，这是说雍正谋父夺位；有的说胤禛把康熙“皇位传十四子”的遗诏做了手脚，改“十”为“于”字，这是说雍正矫诏夺篡。诸如此类的流言后来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不少被人利用做号召人民起来反清。因此，在他即位的头几年，迭兴大狱。不管是雍正的宿敌，还是曾为雍正的鹰犬、后来又跋扈起来的权臣，不管是满洲权贵，还是汉族官员，只要对皇权构成了威胁，那就一律加上“朋党”的罪名，格杀勿论，毫不留情。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究其原因，是他依附年羹尧，雍正为了革除朋党的弊病，就拿他开了刀。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少年轻狂，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考了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他离京往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处找职位。胡是年羹尧亲信死党，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极受雍正宠信。汪景祺借胡期恒这层关系，上书年羹尧自荐，在信中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比起年大将军都不过是小小角色。在这封信快到结尾时，汪景祺说如果不能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年羹尧，那么这辈子就白活了。就这样，汪景祺成了年羹尧入幕

之宾。

可惜好景不长。年羹尧恃宠而骄，擅作威福，植党营私。当年九月雍正帝命将年从杭州解京治罪。在查抄年寓所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那封信，雍正阅后，恨得咬牙切齿。果然，十二月刚处决了年羹尧，便把汪景祺照大不敬律立斩，罗列的罪状有：（1）汪景祺的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讥讽康熙皇帝；（2）讥讽康熙的谥号不宜称“圣祖”。汪景祺《西征随笔》的稿本如今还在，上面并没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的诗句，从《西征随笔》内容看，汪景祺不过是个浮躁轻薄文人，他也没有什么官职，根本算不得年党。但汪景祺妄议朝政，却正是雍正帝最厌恶的朋党恶习。按照雍正帝的命令，汪景祺的头颅要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以警戒汉族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

雍正朝前期的几起文字狱都是雍正帝巩固皇位这一总的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明显地带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性质。

从雍正中期的吕留良案开始，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起大狱是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岳钟琪谋反案引发的。曾静被捕后，供称他的反清思想来源于死了快50年的吕留良。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被他坚拒，以后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相荐举，他索性出家当了和尚，以示根本无意给清朝当官，可见他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

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责任应当曾静自负；但追本溯源，雍正帝也很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曾静之反清，惟吕留良是问”这样的结论。无论出于为清朝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还是为了洗刷旁人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维护个人私德的清白，雍正帝都忍无可忍。经过周密准备，他终于在雍正七年五月亲自发动了这起集中打击吕留良的文字狱。直到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这件文字狱才告结束，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吕留良长子吕葆中及学生严鸿逵戮尸，吕的另一子吕毅中及学生沈在宽斩决，其他被株连的人也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

自从吕留良案揭发出来，文字狱出现了新的动向，被用来作压制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武器；同时，告讦峰起，文字狱多是自下而上举发的。这与雍正前期的文字狱迥然有别。

雍正八年（1730）翰林院庶吉徐骏被人告了，说他“思念明朝，大逆不道”，罪证是他的两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刑部审讯，雍正帝批准，把徐骏杀掉了。但无论如何，“明月”、“清风”之类的诗句绝不会隐伏着厌清思明的政治深意，徐骏以此被诛，实在冤枉之至。紧接着发生屈大均著书案。屈大均有极其强烈的反清民族思想，他的诗文充满了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雍正中期以后的文字狱虽说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但实际情形还很复杂。

由于受到吕留良案的强烈震动，文字狱开始向社会纵深处蔓延。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升官之捷径，而心黑手狠的歹徒为陷害别人，也动不动检举出耸人听闻的文字逆案。雍正中期以后的十几起文字狱几乎都是这样搞起来的。雍正帝对这类小案子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虽然制造了几起大案，但无意于让地方官吏都来效仿，也没有亲自督责各省督抚、学政去挑剔文字。

既然雍正帝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也不敢掉以轻心。雍正中期以后，文字狱从朝廷蔓

延到了民间，是很自然的。如果雍正帝长寿，文字狱恐怕还会泛滥起来。可庆的是，雍正帝在位仅 13 年便猝然离世，新即位的乾隆皇帝为争取人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另有一套施政方针。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有增无减。乾隆皇帝不同意他父亲雍正皇帝的看法。他觉得承认满族是“夷”不妥当，就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部收回，又下令把曾静、张熙再抓起来，凌迟处死。他当皇帝 60 年，文字狱是康熙、雍正两朝的好几倍。

乾隆皇帝下令大肆搜查犯有嫌疑的野史诗文。有举人写了几首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翅，一举去清都”的句子。乾隆皇帝认为“壶儿”就是指“胡儿”，“搁半边”是要推翻清朝；“明朝”本来是说“明天早晨”，乾隆皇帝却硬说是指明王朝；“去清都”本来是说到北京去，可他认定是指废弃清朝。当时，写诗的那个举人和他的儿子都已死去，只有两个孙子还活着。乾隆皇帝下令将死了的鞭尸，活着的砍头。当地的布政使，也因防范不严，失职获罪，被砍了头。还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结果被判了死罪。

朝廷规定，不论诗、文，只要里面有“夷”“狄”“胡”等字眼，就是攻击清朝，就要砍头处死。汉族人如果用这些字眼，会招来杀身之祸。

清朝统治阶级大兴文字狱严重阻塞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一举手，一投足，稍不注意，就要得罪统治者。一些文人学士只好逃避现实，埋头整理古代典籍。清朝统治者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以及文人们“避世”的治学方法，使清朝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化，变得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了。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同西方相比，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朝康熙初年，沙皇俄国开始向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流域扩张。有组织的俄国匪徒经常侵入中国边境抢劫当地人民的貂皮和粮食，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当地的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恨透了这些吃人的恶魔，都叫他们“罗刹”。沙皇俄国先后在黑龙江流域建立了雅克萨和尼布楚两个据点，想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沙皇俄国这样肆无忌惮地吞并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清朝政府当然不肯答应。中国军队多次前去驱赶侵略者。可是，每次中国军队得胜回师之后，沙俄匪徒很快就又卷土重来。沙俄侵占东北边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清朝的统治，而且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清王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军侵占这里，驱逐俄军，收复失地是清朝统治者的强烈愿望。康熙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不可低估，即位后即密切注意着东北的边防，他的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满清入关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清政府正集中全力对付各种军事危机，争夺对全国的统治，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集中到东北，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内地比较平静了，康熙皇帝决心要彻底解决东北边境的沙俄侵扰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亲自到了吉林，在松花江上乘船勘测地形，了解情况，并决定增加兵力，镇守黑龙江地方。同时，他又写信给俄国沙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两国争端。

清政府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军事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和平谈判，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求得比较公正的和平。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两国争端。

康熙总结了长期以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黑龙江瑗瑋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清军到达瑗瑋，即在黑龙江东岸建立城堡，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又在当地屯田。为了保证驻守黑龙江的士兵的粮食供应，还从科尔沁、锡伯、乌喇官屯征集粮食1.2万石，备3年之需，又派人在索伦族居住地区购买牛羊牲畜。

为了建造运兵船，清政府积极准备木料，调集工匠，在吉林设厂，大规模造船。建造各种类型的船只，征调水手，并从沈阳到黑龙江之间修筑运输线。这条运输线路长达5000里，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设防兵，设粮仓，派人在各段实地勘察道路远近和水流深浅，确定所造船只的大小。此外，又从乌喇到瑗瑋开辟了670公里的新驿路，中途设19个驿站，以传递公文、军情。

清军进驻黑龙江之后，首先着手清扫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

为配合清军作战，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展开斗争，

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牛满河上的中国居民打死俄军 10 余人；精奇里江上的鄂伦春族也击毙许多侵略军；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与俄军展开激烈战斗，俄军赶来增援，费雅喀族人民也向清军求援，清兵 300 人冒着冰雪严寒赶去支援，与俄军战于恒滚河口，俄军战败，有的弃械投降，有的逃走。清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

根据康熙帝的指示，清政府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和俄国保持和平。并且，优待被俘的俄国官兵。1684 年，让俄俘携带中国政府的文件前往雅克萨，文件内抄录康熙的谕旨，仍希望俄兵撤离中国的领土，免兴干戈。但是，清朝单方面的和平意愿并没有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决定春暖后发兵收复雅克萨。

在大军向雅克萨进发以前，清政府又作了一次和平努力，由康熙皇帝直接给沙皇写信，希望沙皇迅速撤回雅克萨的俄兵。这封书信由六个俄俘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尽管清政府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但俄国方面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军，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此外，俄国政府还招募哥萨克，编组军队，开到中国来作战。

1685 年 6 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进雅克萨，带去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6 月 23 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24 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25 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 40 多人。接着，清军架设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严重。清军又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生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俄军主将托尔布津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 700 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清军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雅克萨据点内还有 160 多名被俄军扣押作人质的中国人，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告终。

托尔布津退到了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600 名哥萨克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瑗瑛，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构筑城堡工事，妄图顽抗到底。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再次出兵。1686 年 7 月，萨布素率清军 2000 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俄俘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

在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国侵略军共有 800 多人，已做好顽抗的准备。俄军火器较多，有充足的弹药、粮草，还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清军除了一些大炮之外，只有火枪 50 支，士兵们全用刀矛弓箭作战，杀伤力较小，不利于攻坚，

因此未能迅速攻下雅克萨。但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居民助战，屡次挫败出城骚扰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 100 多个侵略军，俄军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清军和俄军在雅克萨相持，为了避免太大牺牲，停止了强攻，在雅克萨周围筑垒挖壕，团团围困。经过长期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800 多俄军最后只剩下 66 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有坐以待毙。

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为了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清政府仍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1686 年 9 月，清政府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和俄国谈判解决边界的冲突。

1686 年 11 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攻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了北京，路上经历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了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件也先后带到了莫斯科。当时俄国正由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不可能再派大量军队到中国去，困守在雅克萨的俄军眼看有被歼灭的可能。沙俄政府为了缓和紧急局势，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奉俄国政府之命，先期赶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清政府以礼接待俄国信使，真诚地希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雅克萨被清军围城五个月，俄军死亡殆尽，城内缺少粮食木柴。1687 年，清军单方面撤离雅克萨返回瑗珲，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才得以结束。此后，中俄双方开始准备和平谈判。

沙俄政府考虑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实力，不得不接受清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但是，并不意味着沙俄放弃侵略。对俄国来说，这仅仅是策略和手段的调整。由于武装侵略遭到了中国的坚强反击，因此不得不改变部署，将军事入侵与外交谈判交替使用，以达到扩张的目的。戈洛文使团正是为执行这一策略而组建的。

戈洛文使团拥有官吏士兵 1900 余人，包括炮兵、火枪兵、骑兵等，沙俄政府授予戈洛文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和中国谈判缔约，也可以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调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和中国作战。沙俄政府规定了戈洛文使团的任务和谈判方案，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以牛满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还训令戈洛文：“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采取行动。”可见，沙皇政府虽然派出了谈判使团，但并没有放弃用战争手段来达到侵略目的的既定方针。

1686 年（康熙二十五年）2 月，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1687 年 9 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这时，俄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1687 年春爆发了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军在克里米亚战败，沙皇政府无力再和中国发生另一场

战争，因此不得不收敛它的扩张活动，改变它和中国谈判的立场。1687年6月，沙皇政府指示戈洛文可以接受俄军撤出雅克萨的主张，但要求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驻军筑城，此后，戈洛文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制订具体的谈判方案。俄国由于面对着国内外的困难局势，不敢冒然和中国决裂开战，因此，不得不考虑和中国达成妥协。

戈洛文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东岸，这时清军已实现了在雅克萨单方面停战撤军的诺言，戈洛文就不急于和中国谈判了。他一面窥探着中国方面的虚实和清政府的意图；同时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使蒙古各部脱离中国，臣服于俄国。俄国的阴谋被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识破，遭到坚决拒绝。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与清朝皇帝康熙关系密切。可是，沙皇却建议蒙古王在必要时予以协助，共同反对康熙。戈洛文根本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蒙古的领袖们具有爱国热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周围，俄国的挑拨分化未能得逞。

戈洛文使团表面上肩负着谈判的和平使命，实际上却是一支凶残的远征军。在无法挑拨蒙古和祖国的关系之后，立即对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发动突然袭击，进行血腥的镇压。戈洛文命令俄军闯进蒙古牧地，大肆烧杀抢掠。

喀尔喀蒙古人民不堪俄军的践踏蹂躏，奋起反抗。1688年初，蒙古军民在色楞格斯克一带打败俄军。可是，正当蒙古人民抗俄获胜之际，在俄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蒙古族的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大举侵入喀尔喀蒙古，与俄军配合作战，夹击喀尔喀蒙古军民。喀尔喀战败，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率部众南走，要求清朝中央的保护和援助。戈洛文和噶尔丹相互呼应，派俄军分路出动，对喀尔喀蒙古大举“讨伐”。还要求中国的蒙古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并威胁蒙古各部的首领要与清政府以及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断绝一切来往。蒙古人民心向祖国，不肯屈服，有的举兵起义，有的伺机逃亡。戈洛文也承认自己的失败，说蒙古各部“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

清政府在1688年派出了大臣索额图为首的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谈判地点。临行时，康熙表明了收复失地的决心，索额图等走到蒙古地区，正碰到噶尔丹的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南逃，使团北上的道路被堵塞，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6月，索额图使团再次出发，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这时，由于噶尔丹打败了喀尔喀蒙古，他发动叛乱的企图已很明显。清政府急需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边疆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促使清政府重新研究谈判立场，愿意作出更大的让步。康熙表示：为了争取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准备将尼布楚城让给俄国。

谈判开始之前，中俄双方都忙于其它事务，彼此不愿作战，希望获得和平，俄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雅克萨，中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尼布楚，这样就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之间的某条线上，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7月底，中国使团先到达尼布楚。使团共有官兵不到3000人，还有水手、仆役、运伕，此外还有供食用和运输用的大批牛羊马匹。使团分两路行进，一路由索额图率领，自北京出古北口，经达尔泊、克鲁伦河、温都河，至尼布楚；一路由萨布素率领，自瑗瑛湖黑龙江而上，经雅克萨，至尼布楚。

这时，戈洛文仍迟迟不来尼布楚，他一方面还在征伐喀尔喀蒙古，强迫

蒙古各部“归顺”俄国；一方面又在加强尼布楚的军事力量，企图利用谈判现场的优势，武力迫使中国使团就范。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已经 19 天，戈洛文还没有来到，却多次派遣信使到中国使团的驻地，指责中国使团没有谈判的诚意，违反国际法准则。说中国使团带来的人太多，是不是要来打仗？又说中国的士兵行为粗暴，在路经雅克萨时杀死了两个俄国人，还提出中国使团的驻地离尼布楚城太近，要求往后退到额尔古纳河口。

尽管戈洛文的指责毫无道理，中国使团仍耐心地说明了自己的和平意愿，索额图说明，自己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当时中俄双方都带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中国使团所带军队不到 3000 人，而尼布楚的俄军也有 2600 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大体上相当，中国方面并无以兵多压人的意思。

中国使团逐条驳斥了俄国的无理指责，向俄方指出，所谓雅克萨两名俄国人被杀之事，与中国无关。事实上，这完全是戈洛文捏造的。

8 月 19 日，戈洛文使团到达尼布楚。接着双方进行磋商，决定会谈从 8 月 22 日开始，在尼布楚城外搭设的帐篷里举行。进入谈判现场的官兵各 300 百人，除刀剑外不得携带火器。

8 月 22 日双方进入会场，俄方先声夺人，排场阔绰，行进时仪仗森严，鼓乐齐鸣，俄方帐篷内陈设豪华，三名使臣（戈洛文、弗拉索夫、科尔尼茨基）衣饰华丽、神态傲慢。俄方的卫队违反不带火器的协议，暗藏手雷。中国方面搭设了一座比较精致的黑帐篷，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仪仗、乐队，七位使臣（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并坐在一起，显示出朴素、自然和亲密一致的气氛。俄国代表那边地上铺着贵重的土耳其地毯。桌上蒙着波斯台毯，上面摆着各种时钟和黄金的墨水瓶，显得既豪华又有些虚张声势。双方经过寒暄之后，就开始讨论如何划分国界。

谈判一开始，索额图和戈洛文之间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俄国的领土，可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戈洛文还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制造流血事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俄国的损失，惩办有关的人员。

索额图严正地驳斥了戈洛文的无稽谰言，指出，“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湖这边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他列举了很多确凿的事实，胸有成竹地反驳说：“尼布楚是我国茂明安部落的旧址。雅克萨是我国达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黑龙江两岸，一直都是我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各部居住的地方。他们年年向大清纳贡，是我大清朝的臣民。贵国 40 年前才到达此地，把我国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索额图说到这里停顿下来，然后提高声音一板一眼地继续说：“贵国应该把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归还我朝，退回到色楞格河以西的地方去。”

索额图简单回顾了俄国侵略黑龙江的历史，指出：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戈洛文把俄军在中国领土上杀人放火的罪行轻描淡写成“小小纷争”，真是荒谬已极。中国政府再三地劝说、警告，俄方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驱逐侵略者，这是正义的行动。挑起战端的责任在于俄国的侵略，如果说“惩凶”、“赔偿”，那就应该由俄国惩办自己方面的凶手并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损失。索额图表示：中国为了争取和俄国实现和平，只

谈边界的划分，力求达成协议，而不是向俄国提出“惩凶”和“赔偿”的要求。

这场争辩涉及到黑龙江流域的归属以及谁是侵略者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戈洛文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接着，戈洛文提出第一个划界方案，即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界。索额图断然拒绝了 this 荒谬的方案，提出以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双方再次交锋，没有结果。

8月23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戈洛文坚持以黑龙江划界，施展了种种手段，时而气势汹汹，时而甜言蜜语，但中国使团不为所动。最后，戈洛文故作姿态，假装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为界，这个方案仍把黑龙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划归俄国，索额图等误以为俄国使团已在让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中国使团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没有制定一个逐步退让的方案，一下子就把康熙指示的最后分界线摊了出来，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戈洛文听到中国政府肯于让出尼布楚，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俄国政府预定的目的已可达到。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勒索更多的利益，他故意和中国使团继续纠缠，拒绝中国的划界方案，不但不领情，反而哈哈大笑，蛮不讲理地说：“敝国真应该为此感谢贵国使臣，把大俄罗斯帝国这一无可争辩的地方让给敝国。”

中国使团不懂得戈洛文的假表演，看到自己的最后方案被拒绝，以为谈判已经破裂，极为失望，准备返回北京。此时，戈洛文买通了在中国使团内充当译员的两名外国传教士，劝中国使团继续留在尼布楚谈下去。原来，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是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原名革比勒，法国人）徐日升（原名佩雷拉，葡萄牙人）。以前，为了换取通过俄国到达中国的权利，徐日升和另一个传教士南怀仁就曾经向在北京的俄国使团提供过重要情报。这次中俄谈判，康熙皇帝命张诚和徐日升随同前往。索额图在会谈中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俩和俄国人的关系有点暧昧，可是中国方面又没有人能胜任翻译，所以，只好仍然让他们担任翻译。

张诚和徐日升见到了戈洛文，向他转达了中国钦差大臣的口信，接着徐日升说：“皇上为了西北部的噶尔丹叛乱很不安。皇上要全力对付噶尔丹，所以急于和俄国缔约。他命令钦差大臣，初议之时，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你们不答应，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现在你们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占领雅克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找一个地方，或许更现实一些。”

戈洛文一面点头，一面把他们的话暗记在心里。两个传教士起身告辞的时候，戈洛文命人取来贵重的貂皮送给他们，亲自把他们送出去很远。戈洛文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帮助下，把中国使团拴在尼布楚，一方面使谈判不致于破裂；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肯达成协议，在一切问题上讨价还价，中国使团急切希望谈判成功，除了已经让出尼布楚以外，又作了许多让步。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划定东段边界，同意了戈洛文的要求，暂时搁置了中段边界的划分。中国使团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分界线退让至尼布楚以东约四五百里的格尔必齐河，这已超过了康熙的指示。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上游南岸的分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450公里，这一广大地区有银矿、盐湖以及大片耕地、牧场，是沙皇政府最垂涎的富饶地区。

中国使团步步退让，实已无可再让，而戈洛文仍在玩弄外交手段，勒索

不已。这时候，受尽俄国压迫、被俄军驱赶到山林里去的中国各族人民，听到中国使团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他们扶老携幼，带着帐篷，赶着驼羊，突破俄军的封锁，来到了尼布楚附近。中国使团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戈洛文害怕中国人民抗俄斗争的发展，赶紧改变策略，拿出沙皇政府预定的划界方案，迅速与中国使团达成协议，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在深夜里急忙派使者到中国使团的驻地，同意撤出雅克萨。中国早已同意让出尼布楚，现在俄国也同意撤出雅克萨，问题已经解决。此后在其他问题和具体细节方面又经过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9月7日晚上，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索额图和戈洛文身穿礼服，同时到达会场。他们先在条约上签字、盖章，然后宣读誓词，相互交换条约。这个条约，就是著名的《尼布楚议界条约》。签字以后，他们互相拥抱，表示祝贺。这时候乐声大作，喇叭、铜鼓、风笛、双簧管齐鸣，帐篷里充满了轻松的气氛。双方官员也改变了过去的敌对态度，亲切交谈，互相赠送礼品，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正式的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本和俄文本。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

《尼布楚条约》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境争执。又规定：中俄两国人民可以过界来往，贸易互市，这是俄方长期以来的要求。

《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条约明确地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条约在领土和贸易方面也满足了俄国的要求，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条约巩固并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相对地比较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尼布楚条约》虽然把原来属于中国的一些土地让给了俄国，但这是清朝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同意的，是双方商议的结果，是平等的条约。从此，在长达150年的时间内，这段边境一直比较平静。

晚清太后垂帘听政

1860年9月22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从圆明园仓促北逃，途中因颠沛流离，得了重病呕血。30日行抵热河避暑山庄，10月初虽然逐渐恢复健康，但逃亡途中，回首往事，放眼山庄，不无“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叹！在这种心情驱使下，咸丰皇帝盼望和议早成，谕令奕訢同英法议和可以尽快办成。10月19日，又在奕訢等人的奏折中批示：“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英法等国如能早退，朕即可起驾回京，以定人心。”

奕訢和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消息传到热河后，10月31日，咸丰皇帝又批示说：只要外国退兵不再反复，朕即可回京。但侵略者不肯立即退兵，声称要在天津过冬，咸丰皇帝担心一旦回銮，英法侵略者卷土重来，因此谕令奕訢等人，在回銮以前，务必和英法侵略者议定，以免再生枝节。这表明咸丰皇帝还仍然准备当年返回京师。

但是奕訢等人认为条约初定，恐怕英法两国会借故纠缠，不肯撤兵，打算待英法联军退到天津之后再与外国交涉其他外交问题。对此，咸丰皇帝大为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情绪支配下，当奕訢等人请咸丰皇帝早日回銮时，咸丰皇帝颁发了暂不回銮的上谕。

当初咸丰皇帝命奕訢留在北京办理议和，咸丰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争取时间，部署兵力。然而奕訢受命之后，却迅速同英法签订了和约，并因此同洋人打上了交道，博得了侵略者的好感，这是咸丰皇帝身边大臣肃顺等人始料不及的。肃顺一向刚愎自用，视满族贵族如酒囊饭袋，就是对奕訢，他们也只称呼他“小六子”，毫不放在眼里。如今奕訢因议和成功，而被朝野上下视为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人，威望大为提高，大部分留京亲王大臣追随其后，势力已经很大，再有洋人的关系，如果咸丰皇帝回京，难免不受其包围影响，因而肃顺等人便极力阻挠回銮。

为了使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乐不思蜀”，肃顺等人极力以射猎或美色来诱惑咸丰皇帝。避暑山庄原有离宫200余所，完好者尚有70余所，有许多可供消遣的去处。和约签订后，肃顺等人令在京的大戏班人员分三批全部到达热河，从此几乎每二三日即演戏一次，每次戏目角色均由咸丰皇帝硃笔决定，有时上午已花唱，晌午还要清唱。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玩得很开心，大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势。与此同时，肃顺等人还大兴土木，修缮行宫。肃顺本人甚至还建筑私寓。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动摇和影响咸丰皇帝回京的念头。

咸丰皇帝在热河整日以观剧打猎为乐，懒于处理政事，使肃顺等人更加大权在握。整个热河，几乎成了肃顺等人为所欲为的天下。

肃顺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拒不让咸丰皇帝回銮进京，遭到留在北京的亲王和大臣们的痛斥与反对。而肃顺则针锋相对，污蔑留守京师的奕訢等人一再要求咸丰皇帝回銮，是挟制朝廷。肃顺等人还指使爪牙望风扑影，谣传恭亲王将借助洋人势力造反。从而引起咸丰皇帝对奕訢的不满，致使兄弟之间感情再度疏远，咸丰皇帝死后把奕訢排斥在赞襄政务王大臣之外，与这次矛盾很有关系。

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病危。在几次昏厥，神志尚清醒时，他召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传谕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又指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助小皇帝，辅助经办一切政务。这是

咸丰皇帝死前按照清朝的祖宗家法，建立顾命制度，以辅佐幼子继位。

8月22日，咸丰帝在避暑山庄病逝。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开始为咸丰帝的丧礼和小皇帝继位忙碌起来。即刻传令，从即日起皇后称皇太后，皇太子称皇上。当日，发布咸丰皇帝遗诏，把咸丰帝上述遗命布告天下。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咸丰帝死后的政权交替工作大体就绪，只待新皇帝回京，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了。

咸丰帝死后，热河曾有人向北京密报政情，对咸丰帝病危立太子这段时间的热河政局曾做过报道。

咸丰帝死后这段时间，热河的政治局势比较稳定，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6岁幼主，齐心协力，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妥当。

咸丰帝死后的政体，是赞襄政务王大臣与两宫太后共执国政，由赞襄政务大臣先把圣旨拟好，皇太后、皇帝阅后，母后盖“御赏”印，皇帝盖“同道堂”印，两宫太后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互相牵制，以防止专权的情况发生。奕訢到热河以前，他们尚无推翻这种政体的举动发生，这种体制是得到当时肃顺与太后双方的承认和拥护的。

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晋封为皇太后。次日，小皇帝载淳生母那拉氏始被封为皇太后。两宫并尊，并非同日，这是肃顺为抑制那拉氏所作的精心安排。肃顺在两宫太后中故意制造矛盾，对秉性宽厚、素无大志的东太后极力拉拢，对西太后那拉氏则极力裁抑，严加防范。于是在咸丰帝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在肃顺和西太后之间进行。其实他们之间的斗争早在咸丰帝生前就已开始。

小皇帝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祖父吉郎阿，曾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父惠征，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长期任笔帖式，从事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咸丰二年又调任安徽宁池道台，所辖五府一州，共计20个县，兼管芜湖关税务，不仅是个要缺，而且是个肥缺。叶赫那拉氏就是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宦的官僚家庭。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叶赫那拉氏生于北京，她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因此她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并受到传统的封建教育。据说，那拉氏年16时已经能背诵四书五经，通满文，二十四史也浏览一遍，而且精通琴棋书画。

那拉氏的小名叫兰儿，父亲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奔南走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

兰儿18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皇宫里皇帝的妻妾很多，分皇后、皇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七个等级。兰儿刚进宫，地位很低，没有什么机会和皇帝亲近。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皇帝吸引住了。他慢慢地走到了兰儿的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爱，不久，又被封为懿嫔。过了几年，那拉氏生了皇子载淳。咸丰皇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下令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进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皇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复。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了，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

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

懿贵妃的干预政事行为，使肃顺、载垣、端华等人的权力受到了侵犯；而肃顺等人向咸丰帝进献美女之事，又使懿贵妃失去咸丰帝的宠爱，由此引起双方的矛盾。双方在矛盾斗争中，都挑拨咸丰帝同对方的关系。其中最使懿贵妃恼恨的是，肃顺等人不仅在逃往热河途中尅扣她的食物，苛待于她，而且竟建议咸丰帝除掉懿贵妃。后来咸丰帝虽然没有杀她，但对懿贵妃已日渐疏远，且在死前给皇后留下遗诏，如懿贵妃日后不安分守己，可拿出此遗诏命令大臣除掉懿贵妃。

咸丰帝病危的时候，肃顺与懿贵妃矛盾更加激化。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赞襄政务，开始想以不封太后的办法，把那拉氏排斥在权力之外；继而又主张圣旨由八大臣拟定，太后负责盖印，不得更改谕旨的内容。西太后坚决反对，最后决定建立了赞襄大臣与太后共同执政这一体制。那拉氏对此尽管心怀不满，但因热河已完全控制在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只能隐忍不发，静待时机。热河政局暂时呈现出一派稳定的景象。但是，从奕訢到热河之后，便风云突变，这一稳定平静的政治局面立刻被打破。

奕訢一直密切注视热河局势的演变。奕訢的亲信、在热河任领班军机章京的曹毓英等人，通过军机处的驿递系统，随时将肃顺等人的举动密报文祥、奕訢等人；还有奕訢七弟奕訢，利用可自由出入宫禁的便利条件，把在热河的行动随时告知奕訢。这样，热河、北京之间彼此互通情报，使奕訢对咸丰帝死后的局势了如指掌。

咸丰帝病逝，遗命肃顺、载垣等八大臣辅政，奕訢被排除在外，这不能不使留守京城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奕訢与咸丰帝亲如手足，虽然两人关系一度疏远，但自从奕訢奉命留守京师，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来，已取得咸丰帝的信任和赞扬。以恭亲王奕訢与咸丰帝的这种血缘关系，加上他的才华和声望，咸丰帝一旦驾崩，幼主继位，按常理，应该由恭亲王当摄政。而今却被排斥在顾命大臣行列之外，怎能不令人感到惊疑？

很明显，照这样下去，肃顺集团的辅政，只能意味着奕訢集团的失势。对此，不仅奕訢集团成员不甘心，就是受肃顺排斥而闲居京师的元老重臣也纷纷行动起来，为恭亲王奕訢出谋献策。要除去肃顺，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执政，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彻底推倒顾命制度，由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而这只有同两宫联合起来才能办到。大计确定之后，奕訢于是决定以吊孝的名义前往热河，以便同两宫接头，肃顺对奕訢前来热河吊孝的请求不便阻止，只得予以批准。

前往热河之前，奕訢曾派人前往英国使馆，通告恭亲王今晚或明早启程前往热河，以便见到太后，向她保证英国人、法国人绝无恶意。

三天之后，恭亲王一行抵达热河。奕訢在咸丰帝灵位前高声痛哭，旁人无不下泪。奕訢的这一举动，使人们感到他确系出自手足之情，专为叩谒咸丰帝而来。

祭后，两宫太后召见了奕訢，这是奕訢、太后之间至关重要的会见。恭亲王去热河时，太后对他很冷淡，因为他没有更早一点儿去那里。经过恭亲王的解释，太后看到了完全信赖顾命大臣的危险。太后于是问恭亲王怎样才能摆脱他们，恭亲王回答，在热河他没有办法，只要朝廷回到北京，他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这次会见，奕訢解除了太后对洋人的疑虑，最终作出了回京发动政变的重大决定。

在这次会见后，奕訢在热河用一周时间，进行了一系列密谋活动。为了不露痕迹，麻痹对方，奕訢不仅本人随时小心，对肃顺等人非常谦卑，而且一再叮嘱同党，不论时局多么险恶，都要忍耐，等到回到北京再算总帐。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奕訢于八月初七离开热河，十二日回到北京。

奕訢离开热河的第三天，御史董元醇便上疏，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开始为政变进行舆论准备。董元醇提出皇上年幼，应该让皇太后暂时听政。紧接着，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又直接给皇太后上奏折请安。清朝的传统规矩是，大臣只能向皇帝上奏折。现在这几个人违反祖制，又要求皇太后主持朝政，这使肃顺等人很生气。他们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命令，不准各级官员向皇太后请安，对胜保等人也要治罪。第二天，那拉氏召见八大臣，直截了当地让他们按董元醇的奏折办事，由两个皇太后听政。原来，不论是董元醇的奏折，还是胜保等人的请安，都是那拉氏和奕訢商量好了的。

肃顺等人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老皇上已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就吵了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

赞襄政务王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这场冲突，以太后的妥协和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西太后的舆论试探受挫折，奕訢党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西太后临朝心切。

在董元醇上疏之前，北京城内的奕訢党人也在酝酿垂帘听政的政变行动。

对于政变者来说，理论准备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至关重要是军事部署。古往今来，任何政变不凭借武力，都很难成功。当时奕訢集团中手握军权的只有兵部侍郎胜保。胜保在议和成功后，再次被起用为钦差大臣，督办山东军务，继而督办河南、安徽军务。咸丰帝病逝后，手握重兵的胜保，公开倒向西太后一边，不等肃顺等人允准，即径自带兵北上热河。

胜保北上抵达北京的当天，奕訢也刚好从热河返回北京。两人在京就政变问题作了周密研究，议定由胜保把军队部署在京郊密云一带，为政变做好军事准备。八月十四日晚胜保抵达热河后，对肃顺等人横眉冷对，但是，向来性情急躁的胜保，这时对政变却持稳健态度，胜保是受了奕訢影响，要待肃顺等人回北京再发动政变。

与此同时，手握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奕訢等人的笼络下，在朝廷中枢的权力斗争中，鲜明地倒向了西太后一边。

有了胜保、僧格林沁的两支武力做后盾，政变已成功在望。但肃顺等人在挫败西太后的舆论试探之后，被小小的胜利所陶醉，自以为顾命制度既符合祖宗家法，又是咸丰帝亲自指定，其合法性已不容置疑。政治危机已经过去，于是肃顺等人便坚信他们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因而盲目自信，从此不再把太后放在眼里。

九月初一日，肃顺等人为了显示对失败者的宽宏大量，主动给两宫太后

加赋新的徽号，母后皇太后称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称为“慈禧皇太后”。两宫太后平等相待，以避免引起西太后的不快。

九月四日，肃顺等人又要求解除他们自己的一些军权，他们的这些军权原本是太后发动政变的重要障碍，现在他们却自动解除掉，这一举动为了表明他们专心致力于摄政事务，以取得太后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但此举在政治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至于他们的空缺，其中至关重要的步军统领一职，改由奕訢的死党瑞常担任。这样，在政变即将发生之前，肃顺等人不但没有注意控制兵权，掌握军队，反而把他们手中掌管的仅有的一部分兵权拱手让给了太后，从而使他们处于极为脆弱的地位，他们的对手却更加立于不败之地。至此，肃顺等人成为政变牺牲品的命运业已注定。

可悲的是，八大臣对此仍浑然不觉，全力忙于老皇帝丧礼和新皇帝回京事宜。

那拉氏和奕訢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和胜保都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以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皇帝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你们七个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领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办，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个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拆开，以便各个击破。

那拉氏比肃顺早四天到了北京。这时候，奕訢早就作好了政变准备。

肃顺等人在返回京城的途中也曾密谋过兵变，计划在途中将西太后杀掉。但西太后早有准备，命荣禄率兵迎驾，预防八大臣暗下毒手，结果八大臣的计划落空。

两宫太后及幼帝一行，从小路以快班轿夫日夜兼程，比肃顺抢先四天抵达北京，为进一步从容筹划和布置政变，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使政变更加稳操胜券。

太后及幼帝一行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京郊，恭亲王奕訢出城迎接。当天，两宫太后在郊外召见奕訢，密谋政变事宜。

此时，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败局已定，政变后的政治体制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因此，当天便由胜保上了一个请太后亲政、亲王辅政的奏折。

胜保奏折首先就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合法性进行了抨击。胜保的议论，等于把赞襄政务王大臣置于非法的位置上，这对他们无疑是致命一击。

胜保为政变成功后设计的政治体制，实质就是皇太后听政与亲王辅政相结合。在奕訢等人看来，两宫太后都年纪很轻，慈安 25 岁，慈禧 27 岁，不了解宫廷内外的政局，更无实际政治经验可言，很难设想这两位年轻的太后会有能力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掌握好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因此必须由近支亲王辅政。以奕訢的地位和才干，辅政之后，肯定会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由此可以推测，胜保意图通过此折，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为奕訢争得更多的实权。

二十九日，太后一行进城，周祖培、贾祜等人再次上书呈请太后垂帘。次日，大学士贾祜、户部尚书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联名上奏，请皇太后亲自主持朝政。

九月三十日（1861 年 11 月 2 日），政变开始。先由两宫太后正式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祜、周祖培等人，皇太后向这些亲王、大臣哭诉载垣、

端华、肃顺等人对皇太后的欺压罪状。周祖培当面奏道：“应该对八大臣从重处罚。”于是西太后便把预先秘密起草的上谕，由内阁在当天向全国臣民颁布。这道上谕还承认载垣等八人为“顾命之臣”，加给他们的罪名是不能与英法联军尽心议和，并阻挠咸丰帝回銮及反对太后垂帘听政等等，对他们的处分也仅仅是解任或退出军机处。

载垣此时尚不知政变发生，当奕訢率桂良、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时，载垣还不许奕訢等人入宫办事。

不久，又另发一道将肃顺马上拿住治罪的上谕。此时肃顺正护送咸丰帝灵柩到达京郊密云，被睿亲王仁寿深夜从卧室中拿获，绑赴京城，投入狱中，同载垣、端华一起监禁起来。三人狱中相见，肃顺怒斥载垣、端华；如果早点听我的话，何至有今日？然而悔之已晚，只能抱恨九泉了！

1861年阴历十月初一，政变成功，慈禧、奕訢集团弹冠相庆，并立即论功行赏。首先，恭亲王奕訢提升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都提拔为军机大臣上行走。

一面是胜利者加官进爵，另一面则是对失败者的惩治处罚。

根据奕訢等人提出的罪状，20余位王公大臣于十月六日联名上奏皇太后，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凌迟处死，景寿等五人从重发往新疆充军。

当天发布的上谕，进一步明确指出，咸丰皇帝并未立遗诏让八大臣赞襄政务，是肃顺他们假传圣旨，从而彻底否定了咸丰的遗命及顾命制度。同时宣布：载垣、端华两人减刑准许他们自尽，肃顺改为斩立决。

上谕宣示后，载垣、端华在宗人府上吊自杀，肃顺则被押赴刑场斩决。临刑前肃顺破口大骂，又不肯跪，刽子手用大铁棍敲断他的膝盖他才跪下受刑。

肃顺被杀，从前受其排挤倾轧者，自然拍手称快。

但是，顾命大臣成为阶下囚、刀下鬼，毕竟违反祖制，有辱国体，因此有一些赞成和支持垂帘听政的人，对慈禧大开杀戒很不以为然。他们上疏太后，请宽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之罪。

当然更有人见肃顺等人失势，不惜火上浇油，落井下石。

其实，慈禧、奕訢的心中很清楚，载垣、端华、肃顺多年大权在握，其党羽在六部九卿肯定非常多，至于依附逢迎拍他们马屁的，更是有大有人在。现如一一究查，广为株连，势必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稳定政变后的局势。为此，慈禧、奕訢在处死载垣、端华、肃顺之后，连下三道上谕，宣布不追究那些爪牙的问题。

不追究爪牙的罪状有利于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同时，奕訢和太后又告诫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不得抗拒垂帘听政，否则严惩不贷！

政敌已经肃清，垂帘应该立即举行。但负责筹划此事的亲王、大臣们，几经商议，却迟迟拿不出符合太后心意的垂帘章程，为此，西太后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待。在这当中，十月五日，周祖培奏请更改“祺祥”年号，改为“同治”。经两宫太后允准，布告天下。而所谓“同治”，即两个太后共同治理国家。这标志着晚清太后专政时代的到来。

十月九日，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典礼，接受百官朝贺。

十月二十六日，垂帘听政的详细计划终于拟定好了，送到两位太后手中，具体规定是：召见内外臣工时，拟请两宫太后、皇上一同坐在养心殿中，在皇太后前垂帘；指派专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

这份章程，终于满足了西太后期待已久的垂帘听政欲望，然而垂帘听政毕竟有违祖制，在两位太后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不能不扭捏作态一番，以收买人心。于是在十月二十六日的上谕中，首先大讲一番两宫太后不得已才决定垂帘听政。

在万事妥贴之后，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满朝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由吏部带领引见，在养心殿向太后行礼。咸丰帝死后所建立的顾命制度，至此宣告彻底结束。晚清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时代正式开始降临。

政变发生后，英国公使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报告晚清政变的经过与结果时，兴奋地说：“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得恭亲王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就英国政府而言，我们的困难就要获得和平解决了。”

英国侵略者对政变表示欢迎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肃顺的排外倾向一直深为不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能否兑现感到担心。他们尽力支持奕訢和西太后发动政变，就是为了在中国找到一位合适的代理人。垂帘听政之后，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更加强大了。

